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BUSINESS SCHOO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王健友書

商言

2016年9月刊

新生军训



英姿飒爽



卷首语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论文写作时间，需要每一位同学来完成四年本科生涯的最后一个规定动作。基于多年对本科生论文审阅的经验，我们汇总了以下观点，希望能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一、论文的选题。论文选题的基本要求是专业性。重申此话题是因为，多年来，我们经常审阅到与所授学位专业相距较远的论文，包括题目本身和写作风格等。如有些毕业论文的选题更像社会学专业，而有些作品更像政府工作报告。在经济管理学科内，论文题目可包括综述类、探讨类、比较分析类和理论验证类等。论文题目的敲定是一个字斟句酌的过程，需要认真思考每个字词的含义，确认其必要性和准确性，遣词造句需要避免出现语法错误和语词歧义。

二、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在选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搜集足够的文献，经过仔细的分析整理，形成大致的逻辑体系。这正是在开题报告中要明确的。资料的搜集整理过程，也是思路得到启发和完善的过程。因此，很多同学的论文进展到这一步时，就已经大致明确了写作的范畴、阐述逻辑、难点和重点所在。

三、论文的写作。首先要提请注意，既然是专业论文，那么就要体现概念、术语和理论上的专业性。某种程度上，写作是一个将碎片化的知识，按照一定的逻辑组织在一起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and 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写作具有一定的创造属性。写作之初，可以选择一二篇你认为最接近选题的参考文献，模仿其逻辑思路来展开。学术抄袭当然是禁止的，但模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收获的学习途径。在此基础上，可以选择不同的研究对象，对模型进行调整或扩展等，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写作方向。其次，论文要重视表达的准确性。要反复地梳理论文的逻辑体系，推敲文章的字词和语句，确保概念清晰，陈述流畅，论证充分，结论合理。论文的所有结论都应是建立在事实或他人文章结论的基础上（论据），再经过逻辑推理（论述），从而使得文章观点水到渠成（结论）。因此，对他人结论的堆砌，甚至部分结论没有事实或逻辑依据，都是值得深度质疑的。

其三，统计或计量模型的采用与否。不可否认，量化甚至模型化已经成为目前经济管理类专业论文写作的重要选择。一个包含了合适统计计量模型的论文有时能为你的工作增色不少。但要注意，引用统计模型只是论证过程中的手段或工具，是为了支持结论而服务的。当然，目前在金融经济学等领域确有很多以统计或计量模型（而非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文献，但它们至少都有着现实的经验基础和明确的实践价值。如果你试图朝这个方向努力，建议确认文献中已经有成功的例子，且事先与指导老师认真沟通，设定可行的努力目标。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论文形式上需要符合学校与院系的毕业论文写作规范。如果说前述对逻辑性的要求体现的是专业能力上的高低，那么论文的形式性就反映了工作态度上的优劣。这一点在此不再赘述，请仔细阅读相关写作要求。

商学院金融系教师 孔继红



2016年9月刊

主 办:
南师大商学院大学生科学技术协会

顾 问:
潘 镇 周 燕 冷开振
李金生 汪丽萍 白俊红

指 导:(按姓氏笔画排序)
乐怡婷 冯 律 白 洋 孙 振
戎 麾 张新星 程 曦

主 编:
王俊磊 马梓鑫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许 诺 李佳宣 张又文

网 站: <http://sxy.njnu.edu.cn/boshi/>
投 稿:
商学院大学生科学技术协会《言商》

编辑部

邮 箱: sxyyanshang@126.com

目 录

卷首语

卷首语.....1

要闻回顾

NOW U SEE ME NOW WE NEED U
——南师商学院学生组织宣讲会院学生会篇.....3

进取创新，激流勇进
——科协第一次全体大会.....4

新生寄语

做好职业规划，迎接人生新篇章.....5

大学，梦起飞的地方
——寄语大学新生.....6

新生如何适应大学生活.....8

学术指导

内容与形式：优化我国大学新生学习指导的关键.....12

学术论坛

企业异质性、东道国因素与中国技术寻求型O F D I
进入模式.....16

创新驱动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收敛还是发散？
.....30

中小企业股权集中度、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 39

累累硕果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记商学院13级大创结项答辩的成功举办.....47

NOW U SEE ME NOW WE NEED U

——南师商学院学生组织宣讲会院学生会篇

孙巧敏

为广纳贤才，并让更多集万千智慧与才能于一身的新同学了解商学院当中的各大组织，经过多日的准备、全身精力的投入，一场别开生面的宣讲会拉开了帷幕。

此次宣讲会有商学院党支部、分团委、学生会、青协、心站、新闻中心、创联、科协（排名不分先后）八大组织参与本次宣讲。其中我院学生会压轴出场，精彩纷呈。我院学生会本次宣讲，分别由文体部的刘璐尧、董文婕，联络部的沈芷薇以及实践部的潘正华上台发言。



我们学生会的陈述，是以电影《惊天魔盗团》为主线，改编为鼓励青年远离无所事事，加入学生会来一展自己的才华这一大主题，由此引出我学生会各个组织的风姿绰约，说到了实践部承办商务谈判大赛等诸多事务，联络部跳蚤市场承办的完美无缺，等等。总而言之，各个组织可分别用一下八字概括：

实践部，商行天下，学以致用；
联络部，在商为商，联商络金；
文体部，文抒体炼，一路竞商；

宣传部，诗情画意，笔墨江山；
办公室，上传下达，统筹管理。
宣讲末尾，傅园慧的彩蛋引得全场一



片大笑。巧用奥运健儿、又为网络红人，稍加改编，不仅表现我们学生会的智慧与潜实力，也是为本次宣讲达到良好效果的一大助攻。

此次宣讲会只是一个精彩的预告，不仅仅是为了向大一新生介绍各大组织各部门的职能，更是对他们精神上的鼓舞，每个组织每个部门都真心欢迎每一个热爱学生工作的大一新生加入。刚踏入大学门槛的新生刚开始适应大学生活，很多新鲜事物映入眼帘，他们讲面临很多学生组织的抉择，通过这次宣讲会更是帮助他们走出迷茫，解决疑惑。我们也看到，新生们此次宣讲会也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期待，这就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效果。也相信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作出正确的选择，为自己的大学生活拉开帷幕，而我院学生会也会因为新鲜血液的注入焕发出更灿烂的光芒，让我们拭目以待！

进取创新，激流勇进

——科协第一次全体大会

周霞

金桂飘香喜迎新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微凉的秋意充盈着南师的校园，在这天朗气清的日子里，商学院科协迎来了首次全体大会。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科学与技术协会第一次全体大会暨新成员欢迎大会隆重召开。主席团成员、各部长以及新老成员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展望着新学期的美好光景。



群英荟萃满堂彩

大会随着主席团成员王俊磊的亮相拉开帷幕，幽默风趣的自我介绍使得会场的气氛格外活跃，为方便新老成员之间增进了解，随后依次进行自我介绍。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16级的小鲜肉也毫不逊色，为大家倾情献唱，如痴如醉、不绝如缕，令人大开眼界，为之叹服。



言辞切切寄期望

在彼此熟悉之后，主席团成员王俊磊为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指出了对新老成员的几点期望与要求，希望各部长能够身体力行，为16级干事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并协调好工作，也希望各位新成员能够积极的融入科协这个大家庭，为科协的发展奉献一己之力。同时也期望科协全体成员能够策划、执行好每一次的活动，努力为商院以及南师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热情洋溢的良好氛围。



携手开启新篇章科协第一次全体大会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圆满落下帷幕，也预示着新的挑战即将来临，希望科协在老师的指导下，在主席团成员的带领以及各成员的积极配合下茁壮成长，努力创造更辉煌灿烂的明天。

做好职业规划，迎接人生新篇章

大学，是人生新的一步！新生活、新环境、新开始，预示着新希望。大学阶段也是新生们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三四年后，很多学生都将面临踏入社会这个门槛，实现就业。由于当今社会就业压力加大，因此对大学新生在大学期间做好职业规划就显得非常必要。

第一步 确定方向目标

全面审视自己，正确地对自己评价，知道自己的兴趣、能力、价值观和理想，优势和劣势。在大学期间挖掘出真正令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从而确定自己的职业方向。了解自己的价值观，有助于搞清自己以什么样的心情看待周围的世界和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

第二步 根据目标设计方案

为自己的规划目标设计几种方案、研究每个方案所需要的能力和条件。当然任何一个方案，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而设计，因此如何基于自己的专业进行职业，正是每个大一新生就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了解专业特点以及各专业主要面向的职业领域，是规划目标设计的前提。在明确自己想干、能干的专业领域的同时，依据社会需求确定最佳方案。

第三步 调整和执行

了解各个职业目标的具体要求，其后具体执行计划，并根据社会需求调整方案和计划，以适应职业发展的需要。参加与自己的职业目标相关的实习，增加自己的能力，培养自己对职业规划的直观了解。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你的职业规划如何，有些能

力是必备的，这也是大学中出现考证热的原因。通常认为有些是属于必考之证：英语四、六级证；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公务员资格考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教师资格考试等。

第四步 参加实践 增强适应性

多了解社会，参加实践，努力做到全面发展。从高分考生到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些学生把考进大学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上大学后，整天沉溺于电脑游戏、上网聊天或谈恋爱，将学业完全置于不顾，到了期末考试时一路红灯，结果被学校劝退，这是极严重的教训。大学新生，一定要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要自立自强。

进入大学，意味着选择了职业方向，迈入了人生的一个崭新时期——职业准备时期，从基础教育转向到专业教育。职业定向，使大学生的学习更具有社会性，开始结合未来的职业进行现实的人生设计。因而，在大学阶段决不能满足于老师教的书本知识，要加强自己动手动脑能力，多参加社会实践，同时要利用图书馆等便利条件，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使自己能够适应将来工作的需要。

刚步入大学的新生，面对着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领域，可能感到惊讶，甚至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大学生应注意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等；还包括从未来职业角度提出的经营管理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宣传鼓动力等。通过这些能力的培养，增强自己对社会的适应性，从而使自己各方面有所发展。

大学，梦起飞的地方

——寄语大学新生

余正文

经过六月的洗礼与漫长的等待，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美好的期望，年轻的朋友们步入了向往已久的大学殿堂，步入了放飞青春梦想的地方。

有人说，大学新生从跨进大学校门开始就必须面对和思考六大问题：一是适应问题。如何在角色上从中学生转变为大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二是做人的问题。如何寻找自己的立身之本，提升人生的境界；三是人生规划问题。如何根据自身特点科学规划大学生涯，为今后的发展做好准备；四是学会学习的问题。如何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发现和挖掘自身潜能，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五是发展问题。如何提升自己的全面素质，为今后人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六是情感问题。如何处理好个人的交友、恋爱等问题。

从零开始

大学是人生成才、成就事业新的起点。学习、工作、生活、社交等各方面都需要从这里开始去摸索、去思考、去实践。

大学与中学的生活、学习方式截然不同。也许你会感到困惑、迷茫、空虚，无所适从，一时无法找到新的目标，无法找到自我的准确定位，甚至可能造成对过去的自我、理想的自我的否定，导致生活学习的不适应；抑或由于环境和角色的变化，打破了先前对大学生活所怀有的浪漫梦幻，从而导致信心丧失，斗志全无，等等。

所以说，走进大学如同站在一条新的起跑线上，你要敢于从“零”开始。

学会规划

一个没有计划的人生就像一场没有球门的足球赛一样索然无味。对于新生而言有很多事情要去思考：怎样学好专业、如何提升素质、是否考研、是否出国留学；大学毕业后到哪里工作、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人生如何发展，如何提升生命的层次，等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现在应该去做些什么，学些什么，体会什么，克服什么，拒绝什么……有些是近期目标，有些则属于长远规划，要善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给自己定好位置；然后开始制订行动计划，选择恰当方式和途径，并落实在行动上。

学生的天职是学习。学校丰富的人才资源是最好的知识来源，图书馆和互联网是培养学习与研究本领的最好途径，大学里的老师是最好的引路人。要努力做到“勤、恒、问、思”。培养自己的质疑意识，不要让自己成为课本或经验的奴隶，要自主地学习、探索和实践。

学会面对

一个优秀的人，不仅具有渊博的知识、卓越的能力，还应当具有高尚的情操、健全的身心、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要诚实守信，勇于奉献，承担起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要有一种对生命、对生活的爱。一个人只有懂得爱并去实践爱，他的人生才更有价值。要学会合作，做一个具有团队精神的人。要积极地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实践活动，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本领。大学不可能一帆风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惑或难题，都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大学里的机遇是均等的，人生的机遇只为有准备的人提供。积极应对，主动出击，彰显自我是大学生活开始的必备条件。

成为自己

许多人喜欢崇拜伟人，喜欢模仿别人，但他们可能忘掉了最重要的一点——成为自己！如何才能成为自己？就是按照你的个性、特点和优势以及社会所欣赏的气质去塑造自己，把社会导向与个性优化发展完美地结合起来。

一是明确未来的自己。即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成为自己的基础，一个未来的合格人才，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明德尚美、遵纪守法，学会思考学习、学会做人做事、学会团结合作、学会生存发展的人，一个能够适应社会变化的人。二是认识现在的自己。作为一名大学生，你的角色定位在哪里？该

怎样看待自己所在的大学和相应的生存环境；三是发掘可能的自己。这就要求你着眼于自己的个性和社会所需，善于从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学习修炼、身心健康、人文素养、人际交往等各方面发掘自己、培养自己；四是规划将来的自己。这就要求你深思熟虑去规划人生、谋划职业。

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但关键的就是几步。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对自己说：“放飞青春理想，我相信我自己，我要成为我自己！”（摘自《大学，梦起飞的地方》，冯刚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9 月出版）

谈新生如何适应大学生活

梁子伊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怎样适应大学生活是高校新生最为关注的话题。在此,笔者谈了如何在心理状态、生活方式、学习方法等方面适应大学生活,旨在帮助大学新生提高认识,尽快进入角色。

关键词:心理状态;生活方式;学习活动;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34(2004)S-0086-03

大学新生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处于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处于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时期。由于阅历较浅、社会经验相对不足、独立生活能力不强、对自己缺乏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又非常敏感,受到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矛盾和冲突。由于入学前后生活和学习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在适应新环境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

1. 心理状态要适应

心理学认为,人在内外界刺激因素发生变化时,便会形成新的心理状态。大学新生从中学进入大学后,内外界刺激因素将发生剧烈而复杂的变化,因而在心理上会出现各

种各样的矛盾,必须正确处理好这些矛盾,在心理上适应大学学习生活,才能“全面、自由、和谐地发展”,奠定好成长成才的良好基础。

1.1 优化学习动机,避免“理想间歇”

我国每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有限,高考竞争相当激烈,加之上大学与就业有密切联系,因而中学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尤为普遍,迫使一些中学为了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往往灌输“现在苦一阵子,考上大学就轻松了,便会乐一辈子”,或用“考上大学穿皮鞋,考不上大学穿草鞋”来刺激,导致有的学生把考上大学当作人生的奋斗目标。一旦考上大学,便有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心理,认为“该轻松了”不思上进,出现“理想间歇期”,导致学习成绩大幅下降。据统计,每年期终考试时,大学新生的补考率最高。这时有的学生不是从学习动机上去找原因,而是埋怨智力不行,怀疑自己是不是上大学的料,往往产生心理失落。

其实大学学习要比中学要求高得多,其艰巨性相应要大得多。可见,“理想间歇期”的出现与国家对学生们的要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它使一部分同学不能很好地完善发展自我,严重者甚至影响到学业的顺利完成。

作者简介:梁子伊(1959),男,高级工程师,从事研究方向:计算机控制、学生教育

大学生学习动机的指向,由低到高有七个层次四种境界:自我、职业;人际、集体;国家、民族;最高理想。所谓优化学习动机,就是要自觉地使其指向由低级向高级升华,把今天的学习与国家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起来,坚持实现自我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才能获得经久不衰的学习动力,避免出现“理想间歇期”,从而把上大学作为人生奋斗的新起点。



1.2 注意心态调整,提高心理素质

心态的调整是极为重要的。中学和大学虽然都是学习的场所,但是毕竟有它们的不同。在中学,学生大多数时间是在教室里听教师讲课,每天在书山题海中旋转。那时不容有“愿”和“不愿”,在某种程度上学生是迫于无奈;教师的苦口婆心、双亲的殷殷期盼、朋友的诚挚祝福,甚至陌生人无意的一瞥,都使其感到肩上的重负。这是一个“他律”的过程。在不断的岁月长河里,已经习惯了他人的管束。而大学生活是轻松、愉快的,是自己的天地,除了填充知识之外,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业余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在醇厚的校园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寻找到了自我,由此而变得成熟,由此而使才华和能力相长。这则是一个“自律”的过程。从“他律”到“自律”,这是心态转换的关键,实现这一转变,就要在人为的环境和自制的氛围里雕刻上“自觉”。

同时进入大学后,要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这是素质教育对大学生的要求,大学生不仅应具备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较强的业务素质和文化素质,还要有较强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只有这样,将来才能更

好地适应社会的激烈竞争,做出一番事业和成就。

1.3 克服“逆反心理”,自觉接受教育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大学生正处于第二断乳期,正在从幼稚走向成熟。这一时期的青年大学生,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日益增强,他们迫切希望摆脱对成年人的依附。思想上他们反对成人把自己当成“小孩子”,要求以成人自居,对任何事物都倾向于持批评态度。为了自我表现和引人注目的需要,行为上有很强的反抗性。但逆反心理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极大地妨碍了自身的进步,严重者甚至滑向错误乃至犯罪的道路。

有研究认为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十有十缺”:有参政意识,但缺乏政治素养;有爱国热情,但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民主愿望,但缺乏民主素质和法制观念;有探索精神,但缺乏分辨真伪的能力;有创新意识,但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有广博知识,但缺乏谦虚精神;有独立意识,但缺乏自控能力;有交际需要,但缺乏道德修养;有雄心壮志,但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有成才愿望,但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些特点说明了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极需正确引导,绝不能小视逆反心理的危害。对来自家长、教师及社会的各种意见,都必须排除感情因素,克服逆反心理,理智冷静地思考,实事求是地决定取舍,自觉地接受教育帮助,这样才能长足进步,使自己更加成熟、逐步完善。



2. 生活方式要适应

许多大学生是第一次离家独自生活,一时间似乎得到了许多自由。不过,如果滥用这些自由,或随心所欲,或负担过重,不顾

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生理节奏,都会导致精神创伤。因此,尽快地建立合理的生活秩序乃当务之急,应注意以下几点。

(1)要有独立生活的心理准备,培养生活自理的能力,独立生活包括自己洗衣服、买饭、洗碗以及自己“打扮”自己和自己“理财”等。一般大学新生没有太多理财的经验,在自己的整个生活中,首先要考虑哪些开支是必要的和可有可无的;还要了解自己家庭的承受能力。然后再制定自己的花钱计划,使之切实可行。

(2)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代表着个人的生活方式,它不仅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对人的未来发展有间接作用。身心健康是确保顺利、成功度过大学阶段的一个重要基础。要想身体健康,就应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要有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的高度规律性是身体健康的保证;有良好的饮食习惯,饮食要有规律,不可暴饮暴食;要坚持适度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当然,保持乐观而平静的心境、积极向上的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3)要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根本因素。作为文化层次较高的大学生,更应该增强劳动观念,小到教室、宿舍的卫生扫除,大到公益活动,都要积极参加,不能拈轻怕重、好逸恶劳。

3. 学习活动要适应

大学的学习与初、高中的学习生活截然不同,大学主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靠的是自学。因此,每一位大学生必须具备自学能力。大学的学习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刚入大学,开始学习的是一些基础知识,而在此期间的学习大部分是以课堂学习为主。在这一阶段,要求每位同学对所学专业的基本概念、原理、规律吃透,系统地掌握知识,并能运用自如,为以后打下基础;大学生生活的后半期一般是创造能力阶段。这个阶段要求学生必须基础牢固,才能了解本专业的最新发展,锻炼自己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

大学新生,正面临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教师讲得特别多,并且不像初中、高中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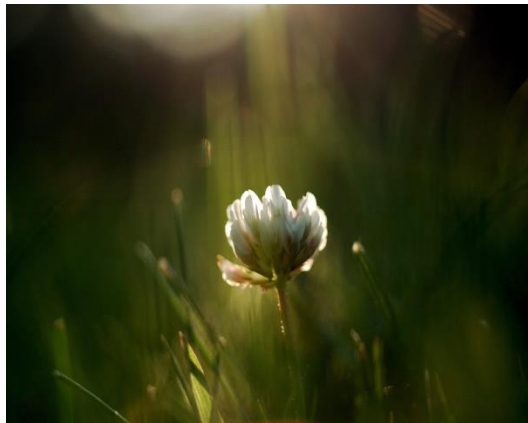
样详细,基本上都是纲要和框架,很难在课堂上全部理解消化,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吃透,而自学能力的培养,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首先要学生从思想上树立起学知识的概念,养成自学的习惯,不但决定能否学到知识,同时决定涉足社会后,能否用新知识来丰富和武装自己。

笔者认为,在大学学习活动中,应当抓住“三重”:

①重点放在基础上,即抓住本专业、各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②重视实习实践,因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实践,知识才能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力量,实习正是对书本知识、理论的深化和实践;

③要注重方法,因为方法比知识更实用、更重要,知识只能用于解决它所适用范围的问题,而方法却具有普遍意义和广泛功能。与其说上大学是来学知识,还不如说是来学方法。



4. 思维方式要适应

有的人学富五车,事业上却毫无创见,或少有创见;有的人学问并不多,事业上却硕果累累,这里就有一个思维素质问题。思维素质的重要体现是思维效率,即在单位时间内,人的思维所能得到的正确思想或正确思想成分的数量和质量。而思维方式则是思维效率的前提或决定因素。因此,在大学学习生活中,应当在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同时,特别注意掌握和训练科学思维方式。

(1)无论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应主动学习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包括形式逻辑和辩

证逻辑)、灵感思维方面的知识,在学习生活实践中加以运用、总结和提高。

(2)不唯书、不唯师,要唯实。应当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问题,灵活主动地去处理问题。

(3)在学习生活中,要把精力集中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上,着重掌握思

路,不要在枝节问题上去劳神费力。

在此,笔者谈了如何适应大学生活,旨在帮助大学新生提高认识,转变角色,尽快地适应大学生活

内容与形式：优化我国大学新生学习指导的关键

王向红

[摘要]大学新生学习指导直接关系到新生能否在短期内完成中学学习向大学学习的过渡，为他们顺利完成大学学业，走向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当前我国大学新生学习指导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尤其应在拓展学习指导内容、改进学习指导形式上采取积极的对策来对其进行改革与优化，以提高学习指导的效益，实现其应有之义。

[关键词]大学新生；学习指导；优化；内容；形式

大学新生正处于中学学习与大学学习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作为更高层次学习的起点，对大学生的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对新生进行学习指导，避免中学与大学学习之间出现“断层”，使两者之间有一个合理的衔接和过渡，这是由中学和大学的特殊矛盾和种种差异定的。大学新生学习指导是大学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新生能否在短期内完成中学学习向大学学习的过渡，帮助新生适应并融入大学的学习、生活环境，促进新生全面和谐发展，并为顺利完成大学学业、走向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我国对大学新生学习指导不够重视，集中体现在学习指导内容单一、指导形式单调等问题上。在这种状况下，拓展学习指导

内容、改进学习指导形式是优化与改革我国大学新生学习指导的关键。

一、拓宽学习指导的内容， 满足新生的实际需要

（一）大学学习目标与大学学习生涯规划指导

相当多的大学新生，不像在中学阶段那样具有明确的“考上大学”的学习目标，存在着大学学习目标的暂时性缺失，出现了“目标真空期”，对未来发展方向困惑和迷茫。还有的新生对大学的期望值很高，进入大学后，却发现学校的现实情况和他们的理想状况有很大的落差，由此产生对当前的失落感和对前途的茫然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要尽早引导新生树立起新的大学学习目标和制定大学学习生涯规划。在具体的学习指导中，帮助新生以全面认识自我为前提，以社会对人才的知识、能力、素养等要求为参考，积极引导新生结合自己所学专业、兴趣爱好与特长、社会需求等方面制定符合自己的大学学习目标，并将整个大学学习目标进一步分解成每个学期的学习目标。制定大学学习生涯规划，有利于引导学生将长期目标短期目标相结合，激发潜力，努力实现大学学习目标和人生价值。

注释：

[1] [德] 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 [M]. 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237.

[2] [英] 亚当姆斯.教育哲学史 [M]. 余家菊译.北京：中华书局，1934.275.

[3] 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76-103.

[4] 杨振宁.南大畅谈素质教育 [N]. 光明日报，2000-4-27.

（二）专业思想指导

根据对部分高校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来看,本专科学学生中非常喜欢自己的专业分别只有 15.3%和 22.0%。[1]大部分新生对所填报的专业知之甚少,甚至所填报的专业志愿是父母的意愿或教师替代的结果。进入大学一段时间后,相当多的新生对所学专业失去学习兴趣。专业思想指导的目的就是帮助新生了解所学专业的基本状况,激发他们的专业兴趣和专业学习动力,形成较稳定的专

（三）选课指导

随着我国选修课制与弹性学分制的进一步发展,选修课的门类不断增加。面对众多的选修课,新生乃至其他高年级的学生都无从下手,选课呈现出零散性、随意性和无目的性。这种现状急需有针对性的选课指导,实现选修课制与弹性学分制的初衷:优化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选课指导主要关注以下方面:

第一,从学生个人的实际出发,选课要向个性优化、个性完善化发展;第二,明确选课的目的,是发挥特长,还是拓宽专业的横向知识,或是深化专业的纵向知识等,要有针对性地选课;第三,注意协调人文、社科、自然三大科学知识体系的课程,基础、专业基础、专业技术三大层次体系的课程比例得当,必修课、限选课和任选课合理搭配,并进行统筹规划。

（四）大学学习策略与方法的指导

大学教学是在一种在宽松、自主的环境中开展的以学生的“学”为主的带有探究意识的活动。这就要求大学新生必须尽快掌握并灵活运用新的大学学习策略与方法。卢梭曾说过:“形成一种独立的学习方法,要比获得知识更重要。”科学的学习策略与方法是实现学习目的桥梁和手段,有利于新生自主地策划、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提高学习能力和学习质量。主要从以下方面对新生进行大学学习策略与方法指导:引导新生进行学习主体的角色转变,由“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由“学会”向“会学”转变;帮助新生掌握并运用元认知策略与方法,资源管理认知策略与方法,以及复述、精细加工、

业思想。专业思想指导应突破当前介绍专业情况的局限性,其主要内容包括:介绍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尤其是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等课程模块、课程结构以及课程之间的关系;了解专业的就业前景以及相关行业或工作岗位群;介绍学科发展情况、理论前沿和专业发展前景;了解专业教学实验室、实践教学环节;介绍专业的特点、考核要求以及独特的专业学习方法等。

组织、解决问题等认知策略与方法;帮助新生掌握并运用适合大学教学过程、大学课程结构要求的学习策略与方法;引导新生学会科学合理地安排、管理学习时间;帮助新生学会检索、查阅参考学习资源。

（五）大学适应性与人际关系指导

从中学到大学,新生面临着生活、环境等诸多的变化。因此,很有必要引导新生认识大学生活的特点,激发自主意识,尽快适应新的大学环境,迅速完成角色的转变。了解大学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特点,教会他们一些生活的知识和技巧,帮助他们提高独立生活、自我管理能力,让他们了解大学生活与中学生活的差异,引导他们从已习惯的家庭生活向大学校园集体生活转变,促使他们适应新环境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能力水平和心理状态,是新生适应性指导的主要内容。另外,还要教给新生一些人际交往的技巧,本着真诚、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的原则,摆脱对家人的依赖,扩大交往面,突破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性,学会与人共处,让他们在与同学的和谐交往中感受成功愉悦,获得他人的支持,顺利渡过大学适应期。

二、建构多样化的新生学习指导形式,增强学习指导的有效性

（一）开发系列学习指导课程对大学新生进行系统的指导

就目前开设的学习指导课而言,多为导论性课程,主要介绍认知科学、学习策略方法等理论性知识偏多,引导学生实际操作的方面偏少,缺乏与通识课程、专业课程教

学的有效衔接；由于师资的缺乏，一般采用大班制上课，缺少师生互动。这些都影响着

效果。近年来，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几所研究型大学开设了新生研讨课，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总体来说，开设系列性学习指导课程，即大学新生学习指导走向课程化在我国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多类型的学习指导课程有待进一步研发。美国大学的新生指导课程丰富多彩，可为我国提供借鉴和启示。早在 1911 年，里德学院就率先提供 1-2 个学分的新生教育课程，并成为大学课程的组成部分。20 世纪 50 年代，哈佛大学首次给新生开设学术性研讨课。据 2001 年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学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研究型大学中有 80% 的学校开设了该类新生研讨课，其中 42% 的大学覆盖半数以上的新生。20 世纪 70 年代，南卡罗莱纳大学开设了一系列为新生适应学习与生活的适应性研讨课，后来发展为国家课程“大学 101 项目”(University101Program)，[4]其他学校纷纷借鉴和效仿。当前，美国大学开设的各类新生指导课程，多的有上百门，少的也有几十门，供学生自主选择。

就我国而言，开发系列学习指导课程对新生进行系统的指导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如何基于对新生的特殊性和实际需要的认识，研发一些内容针对性强、形式灵活多样的学习指导课程，成为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供新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修，以帮助新生后续专业学高等教育研究 652011 年第 2 期(管理研究)服务、为新生适应大学学习和生活服务是我们以后努力的重点和方向。

(二)在各种课堂教学中渗透和深化学习指导

由于受重“教”轻“学”和重“知”轻学习技能和学习习惯。要充分发挥这种学习指导方式的优势和效果，教师不但要主动总结自己学习指导经验，还要系统地学习与研究学习指导的理论和方法，提高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灵活开展学习指导活动的自觉性和水平。同时，学校也要制定相关制度，明确全体教师的学习指导责任，将教师在课

学习指导课程的实际

“能”等传统教育教学思想的影响，以及高考指挥棒的影响，在中小学课堂教学中关注的是知识的讲授，很少对学生进行学习指导。在大学，这种状况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据部分高校学生的抽样调查，只有 3.3% 的学生认为绝大部分教师在教学中重视学习指导，55.9% 的学生认为只有少部分或极个别教师重视学习指导；3.0% 的学生认为绝大部分教师在教学中重视思维能力培养，55.5% 的学生认为只有少部分或极个别教师重视。显然，这种状况难以满足大学学习特点的要求，难以适应学习型社会培养终身学习者和创新型人才的要求。无论是通识课程还是专业课程，都有自身学科的特点。任课教师结合具体课程特点和教学内容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具有学科特色的学习指导，教学生学会学习和发展学生学习能力是教学活动的应有之义，也是提高大学课堂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大学课堂教学中的学习指导的重点是如何科学有效地学好本学科课程及其相关课程，这种学习指导主要包括两方面：学习内容的指导，指向学科知识本身，即“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学习本身活动的指导，指向学科知识的学习，即“如何学习更有成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大学课堂教学中进行学习指导既是学习指导的具体化和深化，也是大学学习和教学创新的时代要求。显然，这种学习指导形式的优点是同各课程教学内容的学习结合紧密，介绍的学习方法具体实用，无论是对课程内容的预习、复习、总结、梳理，还是配套的研讨和答疑，都有益于学生主动学习、深入探究，形成良好的

课堂教学中的学习指导情况及其效果作为教师教学质量考核、评价的重要指标和内容，并为教师的系统学习创造条件，开设学习指导培训班，组织各种研讨活动，提高教师的学习指导能力。

(三)成立大学生学习指导机构对新生进行个别指导

当前,我国设有专门的学习指导部门的大学很少见。就笔者掌握的情况而言,我国仅有不超过 10 所的高校建立大学生学习指导中心。例如,安徽工业大学建立了专门的“大学生学习指导中心”,协调教务处、

学工部、关工委等多个部门,把广大教师、相关管理者、研究人员以及关工委的老同志和离退休教师都组织起来,开展学习指导活动。然而,对绝大多数大学来说,教务部门主要负责人才培养计划与相关管理制度,教师主要负责课程的教学大纲的落实,学生部门以及思政部门主要负责学生日常管理以及政治思想与道德问题,而对学生的学习,却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也没有相关的部门来协调其他部门,共同为学生(包括新生)的学习服务。而在美国,针对学生(包括新生)在大学学习生活中随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或困难,大学通常都设立大学生学习指导(咨询)机构以及专门针对新生的 FYE 中心(FirstYearExperience,简称 FYE,大学第一年教育/体验或大学头年计划)来给予指导和帮助。

例如,哈佛大学专门设有学习咨询局(Bureau of Study Counsel),学生(包括新生)就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挑战、冲突等问题向专门的学习指导人员寻求帮助与咨询。建立专门的大学学习指导机构,除了有利于学习指导的常规化、制度化以外,重点在于通过面谈、热线、网络互动等方式随时接受不同的学生(包括新生)的咨

询,解决学生具体的个性化的问题,有利于进行个别化指导,更好地关注学生(包括新生)个体学习的需要和个体关怀的需求。要有效发挥大学生学习指导机构对新生进行个别指导的作用,我们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积极探索:第一,学校给予足够的重视,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提供一定的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支持;第二,明确学习指导机构的职责以及与其他相关部门的统筹合作;第三,加强学习指导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第四,提高学习指导兼职人员的指导、咨询能力与水平。

注释:

[1] [5] 杜智敏等.大学生学习问题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394,185.

[2] Mary Stuart Hunter, Kathleen A. Murray. New Frontiers for Student Affairs Professionals: Teaching and the First-Year Experience [J]. New Directions for Student Services, 2007 (Spr): 25-34.

[3] Katkin, Wendy. The Boyer Commission report and its Impact on Undergraduate Research [J]. New Direction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2003 (Spr): 19-38.

[4] History of the First Year Seminar & University 101 Program [EB/OL]. <http://sc.edu/univ101/aboutus/history.html>, 2010-06-20.

[6] 屈林岩.改善大学生学习指导促进学与教的创新[J].中国高等教育,2010,(3-4):47-49.

企业异质性、东道国因素与中国 技术寻求型O F D I 进入模式

申俊喜 陈甜（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

【摘要】海外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是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战略研究领域的核心主题之一。本文采用多项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因素对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规模经济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而企业的研发能力对中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模式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但企业成长性则对进入模式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同时，衡量东道国因素的四个指标即人均GDP、法律权利力度、文化距离和研发水平均与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选择正相关，特别是东道国的文化距离和研发水平在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决策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关键词】企业异质性 东道国因素 技术寻求型O F D I 进入模式

【JEL分类】F 2 3

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持续平稳放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动力也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将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同时，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常态，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进入了稳增长、调结构、重质量的新常态。根据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报告，

2014年我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依然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达到1028.9亿美元，与FDI比肩首次进入千亿美元时代。同时，对外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以获取技术为目的的对外投资比重显著上升。由此可见，在不断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的同时，我国也格外重视对外投资的质量，以提高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效率，从而提升技术进步。然而，与此同时，波士顿咨询公司2015年发布的报告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完成率仅为67%成功率远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企业的水平，意味着中国企业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依然严峻。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技术寻求型O F D I 进入式的影响因素，对企业更高质量地进行技术获取型对外投资、更有效率地提升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针对如何提高中国O F D I 质量的问题，本文将从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 F D I 进入式的视角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众所周知，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是决定其经营成败和长期利益的战略性决策，也是对东道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决策（赵晶等，2013）。因此，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而持续的关注，大多

①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13BJY084）、江苏高校哲学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2SJB790036）、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编号：15CX_003G）的阶段成果，并得到江苏省创新经济研究基地的资助支持。

* 申俊喜（1969—），江苏东台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Email: junxishen@sina.com; 陈甜（1991—），山西晋城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Email: cassiechen1991@163.com.

数文献主要从企业微观因素（王根蓓等，2010；Zhao，2011；周经等，2014）和东道国宏观因素（Dikova，2009；López-Duarte & Vidal-Suárez，2010；綦建红和杨柳，2014）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关于企业微观因素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影响的研究主要从企业具有的整体和结构特征出发。吕萍和郭晨曦（2015）基于中国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对其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机制。Diego Quer等（2012）则通过分析2002—2009年139个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数据实证得出跨国公司的整体规模与其选择全资的股权结构模式负相关的结论，即规模越大的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的进入模式，而且企业在选择对外投资进入模式时较少考虑东道国因素。关于东道国因素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影响的文献则主要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方面进行解释。与Quer得出的结论相反，Kogut和Singh（1988）利用228个外国对美投资的数据实证得出东道国非正式制度文化因素对绿地投资、合资新建和跨国并购三种进入模式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周经和刘厚俊（2015）也基于中国跨国企业近十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探讨了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距离和人力资源距离对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作用。研究发现东道国与母国的非正式制度距离与无经验投资者选择新建模式呈倒U型关系，而人力资源距离与有经验投资者选择并购模式正相关。然而，以上这些研究中却较少有专门针对技术寻求型OFDI的特点，对其进入模式予以研究的，并且研究中企业层面的数据也主要是案例分析和问卷调研所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因此，本文可能的创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与以往文献研究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不同，本文专门针对更高层次的技术寻求型OFDI的特

点对其进入模式进行研究；其二，与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是采用案例分析或问卷调研获取数据不同，本文选择企业的实际数据，避免了问卷调查对象的主观性，使研究数据和结果更为真实客观；其三，由于行业存在技术异质性，因而不同行业的企业在进行技术获取型OFDI时存在差别，因此本文考虑比较了对技术层次要求不同的行业因素的影响；其四，本文针对各影响因素对TF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行了研究。0理赖说的提出根据前人的研究，本文提出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的相关理论假说。

1. 企业异质性特征与进入模式的选择

跨国公司是进行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主体，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首要考虑的就是企业的自身特性。本文认为，能够反映技术寻求型企业特性最重要的四个因素是企业规模、研发能力、企业成长性和所有制形式。

（1）企业规模

一般说来，企业规模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实力。规模经济越大的企业，资本存量越大，经济实力和竞争实力越强，承担风险的能力越大，具有大规模并购的实力和优势，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倾向于选择更易获取技术溢出的跨国并购方式。而规模经济较小的企业由于不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足够的资源，在海外市场上新建或者收购当地企业将面临较大的风险，因此更倾向于选择与本土企业合资新建的模式来分担自身资源不足

的限制。Caves和Mehra（1986）、Harzing（2008）的研究均得出了与此一致的结论。此外，对于技术寻求型企业，规模经济越大也意味着其科技研发和管理方面的资源就越充裕，资源整合能力越强，企业采用跨国并购的成功率也越高（潘素昆等，2013）。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在其他条件已定时，中国技

术寻求型企业的规模越大，其选择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高。

（2）研发能力

企业的研发能力是企业科技人员、相关实验设备、整体管理机制和创新型文化的综合运用和整合，是企业长期研发积累的结果，体现了企业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一般认为，企业的研发能力越低，其进行自主研发的难度越大，对技术获取要求的渴求度和紧迫度越高，更偏向于较易获取技术的并购或合资模式（Larimo，2003）。而且，基于垄断优势理论和所有权—内部化—区位折衷范式，国内外学者（如Chao等，2010）普遍认为研发密集型企业最适合采取绿地新建的方式，若采取合资方式则更容易导致技术溢出，从而损害企业的利益。Bhummik等（2005）的研究也得出了与此一致的结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2：在其他条件已定时，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的研发能力越强，其选择绿地新建的可能性越高。

（3）企业成长性

一般学者认为，成长率较低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或者合资模式，而成长率较高的企业则更适宜选择绿地新建。原因可能在于成长率较低企业的资源、管理经验和技術信息较为缺乏，可以通过并购东道国企业或与其合资经营的方式来直接吸收和利用该企业的资源、管理经验和技術信息。Raff等（2012）利用日本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异质性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方式的差异，得出结论成长率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OFDI而不是出口；一旦选择FDI，则更倾向于绿地投资而不是并购。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3：在其他条件已定时，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的成长率越高，其选择绿地新建的可能性越高。

（4）所有制形式

母国企业的所有制形式的不同也会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在资本市

场还不够完善的中国，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拥有更强大的资本优势、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因此更具有竞争力。由于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保证，国有企业更易进行风险程度较高的跨国并购投资来获取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经验等长期战略性资产，民营企业则倾向于采取灵活性较高、对资金要求较弱的合资模式。周经等（2014）学者经研究得出的结论符合理论预期，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选择时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更大。Bruce Stening等（2011）、赵晶等（2013）的研究也证实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4：在其他条件已定时，国有性质的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高。117身41南大商学评论（第33辑）

2. 东道国因素与进入模式的选择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所处的外部环境，因此熟知东道国环境因素也是企业对外投资的必要准备。本文选取东道国人均GDP、法律权利力度、文化距离和研发水平四个反映东道国特征的变量，进行与中国企业TFOFDI进入模式的理论分析。

（1）人均GDP

人均GDP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也是国家竞争能力和技术先进程度的体现。许多学者研究了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同投资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模式之间的关系，所得结论却不尽相同。周经等（2014）的研究得出东道国的实际GDP与中国企业选择新建投资成正相关，而AL-Kaab等（2010）却认为当东道国的GDP较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其潜在的市场容量却比较大时，大多数跨国企业倾向于采取直接新建投资的方式，相反，当东道国的GDP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企业则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本文向于后一种观点，认为东道国的人均GDP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市场规模就越大，跨国并购模式

更容易快速获取被并购企业已有的市场份额，更灵活地对市场投资机会做出反应，更有利于投资企业在东道国迅速站稳脚跟。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5：在其他条件已定时，东道国人均GDP越大，经济水平越高，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高。

（2）法律权利力度

法律权利力度衡量的是东道国法律保护投资人权利进行信贷融资的程度，部分反映了东道国保护知识产权和避免技术外溢的正式制度安排。法律权利力度越高的国家，投资企业越容易获得信贷支持，所投入的技术外部性的交易成本就会越少，从而能够提高技术获取的效率。反之，东道国限制对投资企业的信贷措施则会提高企业的外在交易成本，投资边际回报相应减少，从而增加技术获取的难度，此时，企业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来降低难度。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6：在其他条件已定时，东道国的法律权利力度越高，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高。

（3）文化距离

在研究东道国因素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文献中，文化距离是被广泛考虑的因素之一。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由于不同国家文化间差异的存在增加了信息交流的成本和能力技术转移风险，因而会增加交易成本，企业会选择综合成本最小的进入模式。Lopez-Duarte和Vidal-Sudrez（2010）认为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独资，这是因为组合并购后的企业所需要的协调成本和管理成本与文化距离正相关，因而企业更宜选择独资模式以175企业异质性、东道国因素与中国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11J减少成本。而Harzing（2002）的观点却恰恰相反，认为在多样化模式的选择中，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距离越大，企业

越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跨国并购模式。我国学者綦建红和杨丽（2014）采用KSI指数测度文化距离，实证得出了与之相同的结论，即文化距离同企业选择跨国并购模式显著正相关。本文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来说，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萌芽和发展的起步阶段，经验还相对不足，竞争优势也不明显，为了规避风险，企业适合选择低控制模式的跨国并购进入模式。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7：在其他条件已定时，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距离越大，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高。

（4）研发水平

东道国的研发水平衡量了一国的科技水平。一般说来，在相关领域研发投入较高的国家，其潜在研发技术转化为市场生产力的能力就越强，会拥有更先进的专利技术、更成熟的研发经验和更有效的产品创新。我国企业要通过对外投资来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最直接考虑的因素就是所在区位的技术水平是否已达到该领域的领先地位，这决定了企业逆向技术的可得性。同时，企业还要考虑自身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东道国研发水平较低，我国企业与之的技术差距越小，企业更容易对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因而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或者合资新建模式，而风险更小的跨国并购模式可能更适合技术差距较大的企业。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8：在其他条件已定时，东道国的研发水平越高，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高。

三、指标与数据来源

1. 计量模型建立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所研究的因变量为三元选择变量，因此选择采用多项logit回归模型。本文将跨国并购、合资新建和绿地投资三种进入模式分别定义为1、2、3。模型的估计方程如下：

$$P(y_i = j | x) = \begin{cases} \frac{e^{x_i' \beta_j}}{1 + \sum_{j=1}^3 e^{x_i' \beta_j}} & (j = 2, 3) \\ \frac{1}{1 + \sum_{j=1}^3 e^{x_i' \beta_j}} & (j = 1) \end{cases} \quad (1)$$

此外，也可求得相对风险基本函数为：

$$Mlogit(y) = \ln\left(\frac{p_j}{p_1}\right) = x_i' \beta_j + \epsilon_i \quad (2)$$

其中“j = 1”所对应的一组为参照组，在本文中为跨国并购模式。其中，

$\ln\left(\frac{p_j}{p_1}\right)$ 表示企业选择类型 j 的相对概率； β_j 为影响因素回归系数，度量了变量 x_i 对企业选择其他进入模式相对于跨国并购进入模式的概率的边际弹性； ϵ_i 为随机扰动项。

2. 样本选取

对于技术寻求型 OFDI 企业，由于时间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2014 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名单》中前 50 名具有海外研发经历的企业以及部

分具备海外研发经历的传统汽车机械制造业典型上市公司共 48 家企业 189 个海外子公司。为进一步确保投资企业的技术寻求目的，本文选取的投资东道国主要是当前技术较为先进的发达国家以及相关产业技术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瑞典、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韩国、新加坡等。在剔除同一企业同年在相同东道国投资的样本以及数据不完全的

样本后，共包含 105 个有效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为 1998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之间。

3. 度量指标

为了节省篇幅，变量解释、测度与数据来源见表 1。

表 1 变量解释、测度与数据来源

| 影响因素 | | 变量名称 | 度量指标 | 英文表示 | 数据来源 |
|-------|--------|-------|--------------------|-----------|---------------|
| 被解释变量 | 进入模式 | 跨国并购 | 1 | merger | 上市公司年报 |
| | | 合资新建 | 2 | jointinv | 上市公司年报 |
| | | 绿地投资 | 3 | greeninv | 上市公司年报 |
| 解释变量 | 企业异质特征 | 企业规模 | 当年企业总资产 | size | 国泰安数据库 |
| | | 研发能力 | 当年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值 | RandD | 国泰安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 |
| | | 企业成长性 | 企业对外投资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 | growth | 国泰安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 |
| | | 所有制形式 | 若企业为国有取值 1, 其余为 0 | ownership | 上市公司年报 |

(续表)

| 影响因素 | 变量名称 | 度量指标 | 英文表示 | 数据来源 |
|-------|------------|--|---------|---|
| 东道国因素 | 人均 GDP | 当年人均 GDP 现价美元 | gdp | 世界银行网站 http://data.worldbank.org.cn/ |
| | 法律权利 力度 | 法律权利力度指数 ^① | legal | 世界银行网站 http://data.worldbank.org.cn/ |
| | 文化距离 | 由 Hofsted 指数计算得出 ^② | culture | http://geert-hofstede.com/china.html |
| | 研发水平 | 东道国研发投入 占比与中国研发投入 占比的比值 ^③ | tech | 世界银行网站 http://data.worldbank.org.cn/ |

4. 样本的统计性描述与检验

本文运用 *stata* 12.0 对样本中的数据进行统计性描述, 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以看出, 一些变量的方差相对较大, 可能会影响实证结果。因此,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 首先要对这些异质性较大的变量取对数, 再进行检验回归分析。

在正式的估计之前, 为了检验各变量

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本文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 (见表 3)。结果显示除解释变量 *RandD* 和 *ownership* 的相关系数绝对值为 0.546 外, 其余各变量的相关性系数绝对值均小于 0.5, 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强相关性, 样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表 2 样本统计描述

| 变量 | 变量描述 | 单位 | 观测数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被解释变量 | | | | | | | |
| mode | 进入模式类型 | 0/1 | 105 | 1.876 | 0.906 | 1 | 3 |

- ① 法律权利力度指数是从 2004 年才开始统计的,故本文将 2004 年之前的数据定义为与 2004 年当年数据相同,由于各国该指数的变动幅度小且在样本所在年限内衡量该指数的相关法律如《破产法》和《担保品法》等未经过重大修订,故此定义对估计结果不会有很大影响。
- ② 李平,徐登峰. 独资还是合资——我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管理, 2010(5)
- ③ 部分缺失数据由作者按照十年内年平均增长速度计算得出。

(续表)

| 变量 | 变量描述 | 单位 | 观测数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解释变量 | | | | | | | |
| industry | 所属行业类型 | 0/1 | 105 | 0.333 | 0.474 | 0 | 1 |
| size | 企业规模 | 亿元 | 105 | 349.973 | 540.287 | 6.956 | 3097.71 |
| RandD | 研发能力 | [-] | 105 | 3.099 | 3.265 | 0.006 | 14.157 |
| growth | 企业成长率 | [-] | 105 | 0.336 | 0.588 | -0.173 | 4.687 |
| ownership | 所有权优势: 是否是国有企业 | 0/1 | 105 | 0.495 | 0.502 | 0 | 1 |
| gdp | 人均 GDP | 美元/人 | 105 | 36 695.4 | 13 742.52 | 451.1 | 62 133.6 |
| legal | 法律权利力度 | — | 105 | 7.676 | 2.164 | 2 | 11 |
| culture | 文化距离 | — | 105 | 3.351 | 1.022 | 0.53 | 6.68 |
| tech | 研发水平 | [-] | 105 | 1.817 | 0.855 | 0.155 | 4.851 |

注:单位“0/1”表示在 0 和 1 间取值;“—”表示没有量纲;“[-]”表示变量为某一比值。

表 3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 | industry | size | RandD | growth | ownership | lngdp | legal | culture | tech |
|-----------|----------|--------|--------|--------|-----------|--------|--------|---------|-------|
| industry | 1.000 | | | | | | | | |
| size | 0.207 | 1.000 | | | | | | | |
| RandD | 0.344 | 0.446 | 1.000 | | | | | | |
| growth | 0.062 | 0.155 | 0.069 | 1.000 | | | | | |
| ownership | -0.094 | -0.102 | -0.546 | 0.115 | 1.000 | | | | |
| lngdp | -0.179 | -0.134 | -0.237 | -0.211 | 0.171 | 1.000 | | | |
| legal | 0.031 | 0.009 | 0.035 | -0.065 | 0.007 | 0.3046 | 1.000 | | |
| culture | -0.157 | -0.187 | -0.064 | -0.067 | -0.052 | 0.450 | -0.183 | 1.000 | |
| tech | 0.227 | -0.377 | 0.014 | 0.141 | -0.020 | 0.209 | -0.061 | 0.352 | 1.000 |

四、结果及分析

本文将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分为跨国并购、合资、建和绿地投资三种,运用 *statal* 2.0 中的多项 *logit* 模型对 105 个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回归,来检验企业异质性特征和东道国因素对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对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本文采用的估计方法是将测度中国企业异质性特征的企业规模、研发能力、企业成长性和所有制形式作为基础性变量,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引入反映东道国宏观因素的人均 GDP、法律权利力度、文化距离和研发水平四个解释变量,以便于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精确性,同时可以比较和显示不同东道国投资环境条件下企业异质性特征对其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估计过程分为两步,即分别在模型中先后加入行业虚拟变量,从而考察对技术层次要求不同的行业属性对企业选择模式的影响机制。

1. 不考虑行业虚拟变量的估计

表 4 是没有加入行业虚拟变量的以跨国并购为参照组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模型 1 到模型 6 中,测度企业规模的 *size* 变量系数均为负且通过了 1% 至 10% 的显著性检验,这与假说 1 预期一致并具有高度的统计可靠性。说明企业的规模越大,经济实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越强,企业就越倾向于选择能够快速进行技术寻求的跨国并购模式。体现企业研发能力的变量 *RandD* 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合资新建的系数值均小于绿地投资的系数值,说明企业的研发能力越强,其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就越大,这与假设 2 预期一致。此外,观察测量企业异质性特征的微观变量系数,发现变量 *RandD* 的系数绝对值远大于变量 *size*,说明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进行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时,相比于自身规模,企业更加关注的因素是自身的研发能力。而对于测度企业成长性的 *growth* 变量,其合资新建的系数为负而绿地新建的系数为正,系数结果与假说 3 一致但却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成长性对技术寻求型企业 O

FDI 进入模式的影响不大。这可能是由于企业成长性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不可知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企业在选择以何种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并不能全面准确预测宏观形势,其成长性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测量企业所有制形式的 *ownership* 变量在模型 1 中系数均显著为负,与假说 4 预期一致,表明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进入模式。但在模型 2 和模型 3 中 *ownership* 变量绿地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的人均 GDP 和法律权利力度因素影响了国有企业对进入模式的选择,使其选择绿地投资的可能性更大。在测度东道国宏观因素的变量中,分别体现东道国经济水平、法律制度保障的变量 *lngdp*、*legal* 的估计系数均在 1% 至 10% 的水平上显著,且其系数的符号与假设一致,计量结果高度可靠地支持了假说 5 和假说 6。度量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的变量 *culture*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与母国文化距离越大的国家,如欧美等,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获取技术溢出,这与假说 7 预期一致。同时发现其系数绝对值也相对较大,表明文化距离是企业在选择投资模式之前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反映东道国科技水平的变量 *tech* 的估计系数也均为负,估计结果支持了假说 8。而且较之于其他的解释变量, *tech* 变量的系数绝对值也较大,这表明东道国的科技水平对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选择跨国并购模式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只有在模型 5 的绿地投资部分中, *tech* 的系数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

2. 考虑行业虚拟变量的估计

计

由于不同行业存在技术特性异质性,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也需要考虑到其所处的行业特征。因此,为了探讨行业因素如何影响进入模式决策,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t r y, 若企业属于汽车家电制造业取值为0, 属于通讯软件服务业取值为1, 后者对技术层次和技术敏感度的要求比前者要更高一点。基于105个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后的实证结果见表5。表5与表4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变量s i z e的系数仍然为负, 但显著性水平提升至1%到5%, 这表明在加入行业虚拟变量后, 理论假说1依然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且可靠性增强。变量R a n d D的估计系数除模型1合资新建部分外依然显著为正, 这同样可靠地验证了假说2。而且变量R a n d D的系数绝对值依然远大于变量s i z e, 这同样表明企业在选择进入模式时对研发能力的重视程度更高。g r o w t h变量和o w n e r s h i p变量的系数结果显示和未加入行业变量时一致, 表明经验数据虽依然无法可靠地支持假说3, 却可靠地支持了假说4。度量东道国

宏观因素的四个变量估计系数均与预期符号一致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这说明假说5到假说8均得到了经验数据的可靠支持。此外, 变量c u l t u r e和t e c h的系数绝对值较另外两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绝对值仍然相对较大, 即东道国的文化距离和科技水平在决定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决策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以上结果表明理论假设具有统计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此外, 行业虚拟变量i n d u s t r y的系数为正且部分具有5%至10%的显著性, 表明对技术层次和技术敏感度要求较低的中国汽车家电制造业企业在技术寻求型投资时, 选择跨国并购的可能性比较大, 而对技术层次和技术敏感度要求较高的通讯软件服务业企业则更多地倾向于选择合资新建和绿地投资模式。

表 4 未加行业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

| 变量 | 模型 1 | | 模型 2 | | 模型 3 | | 模型 4 | | 模型 5 | |
|----------------|--------------------|----------------------|--------------------|----------------------|---------------------|----------------------|---------------------|----------------------|---------------------|----------------------|
| | 合资新建 | 绿地投资 | 合资新建 | 绿地投资 | 合资新建 | 绿地投资 | 合资新建 | 绿地投资 | 合资新建 | 绿地投资 |
| size | -0.001* (0.001) | -0.002*** (0.001) | -0.001* (0.001) | -0.002*** (0.001) | -0.001** (0.001) | -0.002*** (0.001) | -0.001** (0.001) | -0.002*** (0.001) | -0.002** (0.001) | -0.002*** (0.001) |
| RandD | 0.165* (0.095) | 0.209*** (0.079) | 0.332** (0.135) | 0.532*** (0.131) | 0.318** (0.131) | 0.542*** (0.126) | 0.316** (0.126) | 0.383*** (0.108) | 0.221* (0.121) | 0.355*** (0.109) |
| growth | -1.802 (1.246) | 0.575 (0.490) | -1.251 (1.334) | 0.861 (0.620) | -1.280 (1.311) | 0.943 (0.656) | -1.172 (1.219) | 0.665 (0.522) | -1.745 (1.465) | 0.907 (0.584) |
| ownership | -0.916* (0.518) | -0.388** (0.137) | 0.183 (0.743) | 1.628** (0.705) | 0.051 (0.689) | 1.525** (0.627) | -0.044 (0.661) | 0.609 (0.530) | -0.598 (0.614) | 0.321 (0.497) |
| lngdp | | | -0.128* (0.068) | 0.225*** (0.066) | | | | | | |
| legal | | | | | -0.151* (0.078) | -0.302*** (0.079) | | | | |
| culture | | | | | | | -0.342** (0.174) | -0.350** (0.136) | | |
| tech | | | | | | | | | -0.195 (0.287) | -0.484** (0.236) |
| Log likelihood | -97.535 | | -89.527 | | -87.703 | | -93.107 | | -95.259 | |
| Wald chi2 | 25.23 | | 34.26 | | 36.75 | | 31.71 | | 27.92 | |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与*分别表示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

表 5 加入行业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

| 变量 | 模型 1 | | 模型 2 | | 模型 3 | | 模型 4 | | 模型 5 | |
|----------------|---------------------|----------------------|---------------------|----------------------|---------------------|----------------------|---------------------|----------------------|---------------------|----------------------|
| | 合资新建 | 绿地投资 | 合资新建 | 绿地投资 | 合资新建 | 绿地投资 | 合资新建 | 绿地投资 | 合资新建 | 绿地投资 |
| industry | 1.033 (0.662) | 0.792 (0.551) | 1.250* (0.665) | 0.957 (0.606) | 1.217* (0.666) | 0.982 (0.619) | 1.153* (0.671) | 0.864 (0.576) | 1.317* (0.692) | 1.192** (0.597) |
| size | -0.002** (0.001) | -0.002*** (0.001) | -0.002** (0.001) | -0.002*** (0.001) | -0.002** (0.001) | -0.002*** (0.001) | -0.002** (0.001) | -0.002*** (0.001) | -0.002** (0.001) | -0.003*** (0.001) |
| RandD | 0.118 (0.100) | 0.166* (0.085) | 0.309** (0.135) | 0.501*** (0.137) | 0.289** (0.132) | 0.504*** (0.131) | 0.279** (0.127) | 0.350*** (0.114) | 0.213* (0.123) | 0.333*** (0.112) |
| growth | -1.993 (1.269) | 0.521 (0.463) | -1.303 (1.336) | 0.784 (0.613) | -1.393 (1.325) | 0.830 (0.653) | -1.307 (1.257) | 0.615 (0.498) | -1.650 (1.434) | 0.853 (0.565) |
| ownership | -1.053** (0.533) | -0.528** (0.376) | 0.145 (0.737) | 1.510** (0.711) | -0.011 (0.687) | 1.394** (0.639) | -0.145 (0.667) | 0.501 (0.546) | -0.558 (0.621) | 0.296 (0.505) |
| lngdp | | | -0.147** (0.067) | -0.230*** (0.065) | | | | | | |
| legal | | | | | -0.170** (0.078) | -0.307*** (0.786) | | | | |
| culture | | | | | | | -0.370** (0.175) | -0.362*** (0.137) | | |
| tech | | | | | | | | | -0.369 (0.300) | -0.608** (0.244) |
| Log likelihood | -95.968 | | -87.365 | | -85.615 | | -91.276 | | -92.553 | |
| Wald chi2 | 26.80 | | 36.31 | | 38.27 | | 33.14 | | 31.26 | |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与*分别表示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

六、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宏观因素视角提出了关于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八个理论假说,采用多项logit模型,探讨了这些因素在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投资模式选择中的作用方向和相对重要程度。由于是否加入行业虚拟变量实证分析差别不大,因此本文得出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

1. 关于企业异质性解释力

本文选择企业规模、研发能力、企业成长性和所有制形式来体现企业的异质性。估计结果是无论是否加入行业虚拟变量,测度企业规模的变量size的估计系数都与假说1预期一致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即规模经济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测度企业研发能力的变量RandD的实证结果也有力地支持了假说2,说明研发能力高的企业选择绿地新建的可能性更大,并且RandD系数大于size系数表明相比于自身规模,企业更重视研发能力的强弱。growth变量的系数结果与假说3一致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企业成长性对其选择何种进入模式没有影响。测度企业所有制的变量ownership的估计系数与假说4一致,即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但东道国环境的部分因素会影响国有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此外,在加入行业虚拟变量以后的结果表明对技术层次和技术敏感度要求较低的汽车家电制造业企业在技术寻求型投资时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进入模式,而对技术层次和技术敏感度要求较高的通讯软件服务业企业则选择合资新建或绿地投资模式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企业在选择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时要立足于自身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和所处行业要求的技术特征。跨国并购和合资新建是较易接近技术的进入方式,但对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的资源整合能力要求也较为严格,企业在做战略决策时要立足自身,谨慎考虑,深入调查,不可贸然选择。此外,由于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创新具有技术外部性,因此政府

也要给予技术寻求企业一定的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给予企业补赠,完善公共基础设施,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企业研发的积极性,不仅加大研发经费投入,还要加强研发人员管理,提高企业的研发水平及研发转化为生产力等技术消化吸收能力。

2. 关于东道国因素解释力

本文选择东道国人均GDP、法律权利力度、文化距离和研发水平来衡量东道国环境因素。这些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假说5到假说8预期一致,并得到X184了经验数据的可靠支持。特别是culture和tech的估计系数绝对值相对较大,说明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距离及其研发水平对企业选择进入模式的影响力较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企业在进行技术寻求型OFDI时,要充分全面考虑东道国因素,主动加强与当地政府的联系,尽量减小企业对东道国投资的风险,提高边际投资回报率,优化技术获取的效果。同时,企业要重点关注东道国和母国的文化差异,完成跨文化探索、跨文化理解、跨文化适应、跨文化独立运作

(李平等,2010),减少文化整合的困难,降低外在交易成本。此外,政府也应该加强与世界各国平等互惠的合作与交流,尽量减少与东道国政府的摩擦,降低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入门槛。同时,政府要向企业公开透明地提供世界各国的各方面有用信息,避免重复搜寻,降低技术寻求企业信息搜寻的成本,提高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的效率。

参考文献:

- [1] Desislava Dikova. Performance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Does psychic distance matter?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9 (18): 38-49.
- [2] Cristina Lopez-Duarte, Marta M. Vidal

- Suarez. External Uncertainty and Entry Mode Choice: Cultural Distance, Political Risk and Language Diversity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0 (19): 575—588.
- [3] Diego Quer, Enrique Claver, Laura Rienda. Chinese Multinationals and Entry Mode Choice: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and Firm-Specific Factors [J]. *Frontiers of 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 2012 (6): 1—24.
- [4] Bruce Kogut, Harbir Sing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 (3): 411—432.
- [5] Richard E. Caves, Mehra, Sanjeev K. Entry of Foreign Multinationals into U. 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 E. Michael. *Competition in Global Industries* [C]. Cambridg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6.
- [6] Anne-Wil Harzing, Alan J. Feely. The language barri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Q—subsidiary relationships [J].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8 (15): 49—61.
- [7] Mike Chen—Ho Chao, Vikas Kumar.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international diversity—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0 (45): 93—103.
- [8] Jean—Franc Ois Hennart, Jorma Larimo.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the strateg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Does national origin affect ownership decision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8, 29 (3): 515—538.
- [9] Raff Horst, Ryan Michael, Stahler Frank. Firm productivity and the foreign market entry decis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012. 21 (3): 849—871.
- [10] Mohammed Al—Kaabi, Mehmet Demirbag, Ekrem Tatoglu. International Market 企业异质性、东道国因素与中国技术寻求型 OFDI 进入模式 185 Entry Strategies of Emerging Market MNEs: A Case Study of Qatar Telecom [J], *Journal of East—West Business*, 2010. 16 (2): 146—170.
- [11] 赵晶, 王根蓓. 创新能力、所有权优势与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3

(2): 100-112.

[12] 綦建红, 杨丽. 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OFDI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大型企业的微观数据检验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 (6): 55-61.

[13] 吕萍, 郭晨曦. 治理结构如何影响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

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

[J]. 财经研究, 2015. 3 (3): 88-99.

[14] 王根蓓, 赵晶, 王馨怡. 生产力异质性、市场化进程与在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选择—基于ML-Binary Logit

模型的实证分析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 12 (12): 127-137.

[15] 周经, 蔡冬青. 企业微观特征、

东道国因素与中国OFDI模式选择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4 (2): 124-1

34.

[16] 周经, 刘厚俊. 制度距离、人力资源与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J]. 外贸经济, 2015. 1: 73-79.

[17] 李平, 徐登峰. 独资还是合资—我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 [J]. 经济管理, 2010 (5): 57-63.

[18] 潘素昆, 郑乔云.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研究 [J].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13. 12: 7-11.

[19] 葛顺奇, 罗伟.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公司竞争优势 [J]. 管理世界, 2013 (6), 28-42.

[20] 李善民, 李昶. 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J]. 经济研究, 2013 (12): 134-147.

创新驱动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 收敛还是发散？

白俊红 王林东（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创新驱动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作用，却忽视了其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大陆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创新驱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实证考察创新驱动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驱动对全国和东、西部地区的经济收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影响了中部地区经济的收敛进程；周边地区创新驱动对地区间经济收敛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本地创新驱动的影响并不稳定，甚至可能拉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关键词： 创新驱动 经济差距 收敛 发散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4万亿美元，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庞大的经济体量背后，却是长期依赖于要素驱动，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在经济“新常态”下，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与环境等矛盾日益凸显，难以为继。在此情形下，国家审时度势，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重构经济增长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新时期引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战略内容。

事实上，自中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各地区纷纷响应，出台各类政策措施，积极推进这一战略。然而，从现实来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较大差距，这也决定了各地区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的基础条件以及能力水平并不完全一致。东部相对发达的地区，在人才资

源、创新体系以及科技环境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无疑有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落实以及更快的生产率增长，进而可能拉大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当然，落后地区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此次发展契机，一方面努力改善创新环境，加强自身创新能力建设；另一方面发挥后发优势，积极学习先进地区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亦有可能实现对先进地区的追逐与赶超，进而达到经济收敛的目的。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是，创新驱动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如何？是促进了地区经济的收敛还是发散？回答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全面认识创新驱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价值，进而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学术界关于创新驱动的研究已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探讨了创新驱动的内涵（刘志彪，2011；洪银兴，2013），论述了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存在的困难及不足之处（吴敬琏，2011；张来武，2011），考察了创新驱动在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作用等（吴敬琏，2011；刘志彪，2011；洪银兴，2013），然而却忽视了创新驱动对地区经济差距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相比于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最终会由于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而不能持续，创新驱动不仅可以通过激发创新能力来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还可能由于各地区创新能力不同而影响到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后劲，进而对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通过探讨创新驱动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不仅拓展了创新驱动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研究内容，而且从政策层面来讲，对于政府相关部门科学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章的后续安排为：第二部分对既有文献做简要回顾；第三部分建立计量模型，并对变量和指标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内生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作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致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源泉（Grossman和 Helpman, 1991；Barro和 Sala-i-Martin, 1997）。一些学者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创新过程中的技术扩散效应，认为只要落后国家能够通过向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来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就可能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速度，并最终实现经济水平向发达国家收敛（Abramovitz, 1986；Barro和 Sala-i-Martin, 1997；林毅夫和张鹏飞, 2005）。当然，由于不同国家间技术创新的基础、发展程度或者吸收新技术的能力有所差异，如果落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创新环境未得到明显改善，那么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可能会持续扩大（Grossman和 Helpman, 1991；Young, 1991）。关于我国技术进步与经济收敛的关系，学者们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即相较于国际市场，一国内部的技术扩散和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国内落后地区更容易从发达地区引进技术和资本等创新要素，从而获得较快的发展速度，缩小与先进地区之间的差距。因而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可以促进地区间的经济收敛（任玲玉等, 2014；杨朝峰等, 2015）。

与技术进步的狭义概念相比，创新驱动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全面创新（陈波, 2014）。创新驱动通过激励创新生产和改善创新环境，对研发人员、研发资本等创新投入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以提高创新产出绩效，从而促进创新产出成果在商业上的应用与扩散，并最终推动内生经济增长（刘志彪, 2011；洪银兴, 2013）。换言之，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一个从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全过程，

而这一过程中一定的创新投入能否获得更多的创新产出，还需要地区自身创新环境的支撑。因此，一个地区的创新驱动能力主要体现在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和创新环境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将可能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第一，地区间创新投入水平的差异影响地区经济差距。发达地区，一方面其自身创新资源丰富，创新投入较多，另一方面生产效率也较高，这也有助于其吸引更多研发资本和人员的流入，使得该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水平进一步提高，从而也进一步强化了该地区的区域优势，致使其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持续扩大。但是，随着欠发达地区科研投入的不断加大和创新收益率水平的逐步提高，亦将有可能引起研发资本和人员流动的相应变化，从而使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创新投入差距得以缩小，并且伴随着外溢效应的扩散和资本回流现象的出现，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也可能有所缓和（王小鲁和樊纲, 2004）。第二，地区间创新产出的差异影响地区经济差距。发达地区在科技成果产出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无疑有利于其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并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从而拉大了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但是如果欠发达地区能够积极发挥后发优势，努力完善本地区创新体系和产学研合作体系，使其在增加创新产出的基础上，更为便捷地引进先进技术和科技成果，并引导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有可能实现与发达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林毅夫和张鹏飞, 2005）。第三，创新环境的差异影响地区经济差距。发达地区在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优势明显，这也有助于促进其经济较快增长，从而可能拉大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这一状况的长期存在将可能导致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和“倒流效应”，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创新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央政府扶植政策的有效实施有利于优化欠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配置，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最终可能

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徐现祥和李郁，2005）。

进一步地，由于创新要素在地区间流动以及技术的扩散和溢出，可能致使一个地区的创新活动不但对自身产生影响，还会对其它地区造成影响，即空间效应（韩永辉等，2015）。这种创新活动的空间效应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如果一个地区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研发要素便会在趋优机制的引导下，自发向这些地区流动，以期获得更高的收益。研发要素的这种地区流动就使得创新活动具有空间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在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治理背景下，众多区域问题都植根于区域间的相互影响，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导致了地区间的区域互动（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在中央将创新驱动作为一项政绩衡量标准时，地方政府会创造各种有力条件提高本地区的创新能力，同时有助于吸引其它地区的创新资源向本地区流动，但是迫于竞争的压力，其它地区政府也会积极提高本地区的创新能力，从而产生良性互动（白俊红和卞元超，2016）。这样，一个地区的创新驱动便会为另一个地区产生影响。创新活动的这种空间效应的存在，也可能使得假设各地区相互独立的经典计量方法失去了可行性。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从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这一新的视角，科学考察创新驱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为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参考。第二，考虑创新活动可能存在地理上的空间效应，应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来实证考察创新驱动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从而使得估计结果更加贴近客观现实。第三，相比于以往研究主要从创新投入或产出的角度来研究创新对经济收敛的影响，本文将通过构建创新驱动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区域创新驱动能力做较为全面地测评，在此基础上考察创新驱动对经济差距的影响效果，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

在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创新驱动与经济收敛的关系之前，我们需要对创新驱动和经济发展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予以检验。本文通过计算 Moran' I 指数来检验中国区域经济和创新驱动是否具有空间自相关特征。Moran' I 指数的定义为：

$$Moran' I = \frac{n}{\sum_{i=1}^n \sum_{j=1}^n w_{ij}}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x_i - \bar{x})(x_j - \bar{x})}{\sum_{i=1}^n (x_i - \bar{x})^2} \quad (1)$$

其中， x_i 为观测值， w_{ij} 为 0-1 空间权重矩阵。

（二）考虑空间效应的条件 β 收敛模型

传统研究在运用经典计量模型对我国经济的收敛性进行检验时，各地区被看成是相互独立的个体，即假设各地区不存在空间上的相互联系。然而，现实中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都不可能独立存在，每个经济区域之间彼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区域间的要素流动、技术扩散和外溢等，都会使得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相互影响、发生联系，特别是当地区之间相互临近时，这种联系可能更为明显（白俊红和蒋伏心，2015）。在此情形下，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回归，就可能产生研究结论与实际不符的问题。为了避免不考虑空间相关性而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我们拟采用引入空间相关的条件 β 收敛模型对经济收敛性进行检验。构建的空间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1、条件 β 收敛的空间滞后模型

$$\frac{\ln(y_{it}/y_{i0})}{T} = \alpha + \beta \ln y_{i0} + \rho W \left(\frac{\ln(y_{it}/y_{i0})}{T} \right) + A_1 W \cdot \ln n + A_2 \cdot \ln n_{(-1)} + C X_{it} + \varepsilon_i \quad (2)$$

其中， β 为收敛系数， y_{i0} 和 y_{it} 分别为各省区期初和期末的实际人均 GDP， T 为观察期的时间跨度， ρ 为空间滞后系数， W 为空间权重矩阵， $W \cdot \ln n$ 表征邻近地区创新驱动，而 $\ln n_{(-1)}$ 表征本地区创新驱动。这里考虑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滞后效应，我们取其滞后一期值（宋马林

和王舒鸿, 2013; 赵锦春和谢建国, 2014)。而相邻地区的创新驱动 $W \cdot Inn$ 仍取当期值, 主要是因为周边地区对本地区的创新溢出通常是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 可以直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而本地区自主创新过程中产生的新技术则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转化为经济效益。

2、条件 β 收敛的空间误差模型

$$\frac{\ln(y_{it}/y_{i0})}{T} = \alpha + \beta \ln y_{i0} + CX_{it} + (I - \lambda W)^{-1} \mu_i + A_1 W \cdot Inn + A_2 \cdot Inn_{(-1)} \quad (3)$$

在上式中, λ 为空间误差系数, μ 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向量。

另外, 根据收敛系数的估计值, 还可以计算收敛速度 s , 以及收敛的半生命周期 τ , 即落后地区追赶上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时间。计算公式分别为:

$$s = -\ln(1 + \beta) / T \quad (4)$$

$$\tau = \ln(2) / s \quad (5)$$

(三) 变量与数据处理

创新驱动 (Inn)。虽然目前已有一些文献对创新驱动进行了探讨, 但大都集中于理论含义方面的阐释, 对其进行量化评估的研究并不多见。鉴于此, 本部分内容拟尝试应用统计分析方法, 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创新环境三个方面来衡量地区的创新驱动能力。其中, 创新投入是区域创新生产的前提和基础, 为创新驱动提供要素支持, 我们用地区 R&D 经费支出和 R&D 人员对其进行显性化表征; 创新产出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创新发展水平, 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提供知识和技术保障, 我们用发明专利授权数、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三个显性指标对其进行表征; 创新环境反映了地区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条件水平, 我们从地区劳动者素质、地区基础设施、政府支持水平以及对外开放水平四个方面来表征, 并分别用平均受教育年限、邮电业务量占 GDP 的比

重、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以及外商直接投资额四个显性指标来衡量。最后, 我们应用因子分析法将上述的显性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并计算综合因子得分, 然后以此综合得分作为创新驱动能力的最终衡量指标。

在测算创新驱动综合得分的基础上, 本文运用条件 β 收敛法, 以实际人均 GDP 的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创新驱动作为其中的核心解释变量, 考察创新驱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同时, 出于稳健的考虑, 我们还控制了一些其它变量, 包括: 政府行为 (gov)、基础设施水平 (inf)、居民消费水平 (C)、对外开放程度 ($open$)、人力资本 (HC)、产业结构 (IS)。其中, 本文采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政府行为; 通过邮电业务量占 GDP 的比重来表征基础设施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由各省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 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分别为在校大学生数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实证检验过程中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对在校大学生数和居民消费水平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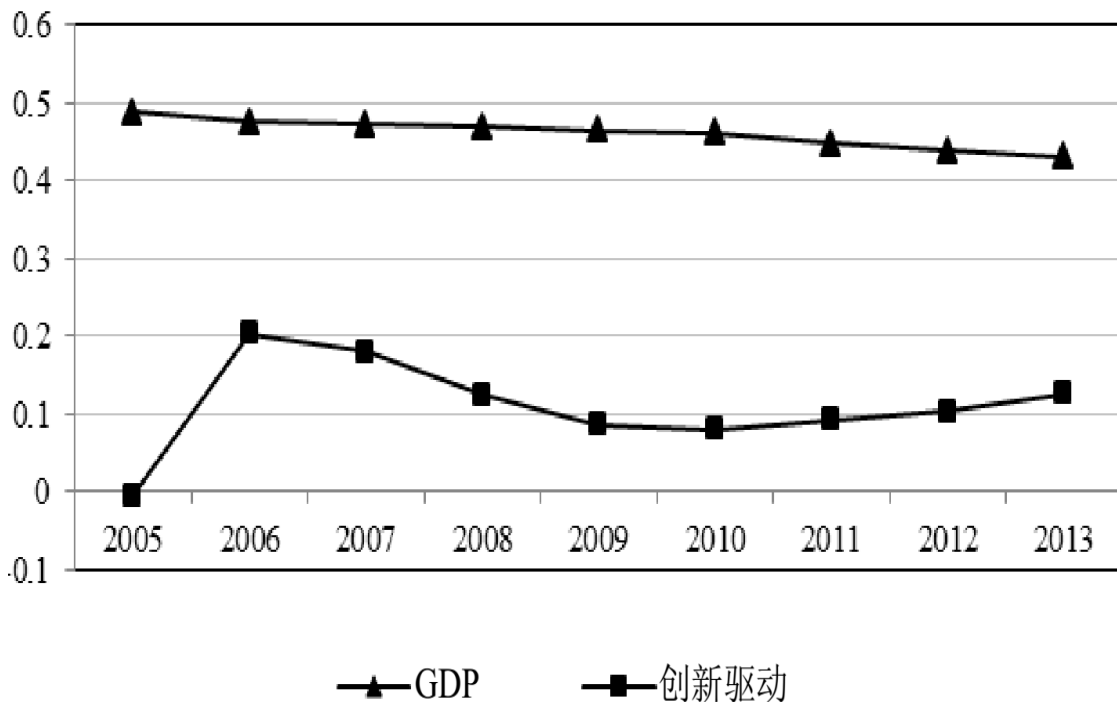
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于 2012 年才被明确提出, 但事实上自 2005 年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来, 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已逐步得到贯彻执行, 因而本文的考察时间从 2005 年开始。这样, 本文以 2005-2013 年中国大陆 30 个省、市、自治区为分析样本, 而西藏由于相关数据的缺乏, 研究中暂时不予考虑。文中涉及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等。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Moran' I 指数检验

利用 Moran' I 指数对我国各地区的实际人均 GDP 和创新驱动综合得分进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结果序列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各地区实际人均 GDP 和创新驱动的 Moran' I 指数



中国各地区实际人均 GDP 的 Moran' I 值均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并且数值都在 0.4 以上, 表现出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这说明我国的区域经济活动并不是相互独立进行, 而是在地理空间上相互影响。另外, 相比实际人均 GDP 的 Moran' I 指数, 中国各地区创新驱动综合得分的空间相关性较弱, 但是除了 2005 年以外, Moran' I 指数也在 0.1 附近或以上, 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活动受到地理空间效应的影响, 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接下来, 我们将利用公式 (2) 和公式 (3) 考察经济增长收敛与

创新驱动的关系。

(二) 创新驱动与经济收敛

为了更直观地表现创新驱动对我国经济收敛的影响, 本文在利用以上数据对我国各地区实际人均 GDP 进行条件 β 收敛检验时, 将计量模型分为不考虑创新驱动和考虑创新驱动两种情况。另外, 根据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标准, 在比较拉格朗日乘子及进一步对比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中各种固定效应的 R^2 , R^2 以及 LogL 后, 确定在不考虑创新驱动和考虑创新驱动的情况下, 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均使用空间误差模型 (SEM) 中的地区固定、时间不固定效应 (sF) 进行收敛性检验。估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条件 β 收敛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 变量 | 不考虑创新驱动 | | | | 考虑创新驱动 | | | |
|------------------|----------------------|---------------------|----------------------|----------------------|----------------------|---------------------|----------------------|----------------------|
| | 全国 | 东部 | 中部 | 西部 | 全国 | 东部 | 中部 | 西部 |
| α | 0.432*** (0.000) | 0.445*** (0.000) | 0.445*** (0.004) | 0.292*** (0.007) | 0.411*** (0.000) | 0.462*** (0.000) | 0.566*** (0.003) | 0.351*** (0.009) |
| β | -0.088*** (0.000) | 0.0002 (0.995) | -0.123*** (0.001) | -0.156*** (0.000) | -0.104*** (0.000) | -0.037 (0.256) | -0.112*** (0.007) | -0.176*** (0.000) |
| λ | 0.529*** (0.000) | 0.442*** (0.000) | 0.480*** (0.000) | 0.430*** (0.000) | 0.621*** (0.000) | 0.627*** (0.000) | 0.468*** (0.000) | 0.518*** (0.000) |
| W_{Inn} | / | / | / | / | 0.046*** (0.001) | 0.039*** (0.006) | 0.050 (0.433) | 0.061** (0.018) |
| Inn_{-1} | / | / | / | / | 0.007** (0.027) | 0.012*** (0.000) | 0.016 (0.426) | -0.016 (0.160) |
| s | 0.012 | -0.000 | 0.017 | 0.021 | 0.014 | 0.005 | 0.015 | 0.024 |
| τ | 60.198 | -27728.660 | 41.175 | 32.695 | 50.496 | 147.080 | 46.683 | 28.645 |
| $\overline{R^2}$ | 0.828 | 0.842 | 0.784 | 0.753 | 0.846 | 0.893 | 0.779 | 0.773 |
| $LogL$ | 666.966 | 251.385 | 183.855 | 245.621 | 675.685 | 263.129 | 184.827 | 257.463 |

注：括号内数字为显著性概率 p 值；***、**、* 分别代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此项为空；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予以略去。

由表 1 的估计结果可知，在不考虑创新驱动的情况下，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的收敛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但是东部地区收敛系数估计值为正。这表明在考察期内，全国范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条件 β 收敛特征，并且经计算，收敛速度为 1.20%，半衰期 60.198 年；中、西部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收敛速度分别为 1.68% 和 2.12%，半衰期分别为 41.175 年和 32.695 年；东部地区不存在俱乐部收敛。

考虑创新驱动后，全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存在显著的条件 β 收敛特征，且收敛速度提高到 1.37%，半衰期缩短为 50.496 年；东部地区收敛系数估计值变为负；西部地区仍存在俱乐部收敛，且收敛速度加快，半衰期缩短；中部地区的收敛速度减慢，半衰期延长。研究结论表明创新驱动有助于促进全国和东、西部地区的经济收

敛，但减缓了中部地区的收敛速度。创新驱动对中部地区经济收敛的负向作用可能是因为中部俱乐部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创新基础条件和能力水平有较大差距，致使创新驱动发展较好的地区发展速度更快，创新驱动发展较差地区的发展速度更慢，从而也延缓了中部地区的收敛进程。

上文分析中，我们对周边地区和本地区的创新驱动同时进行了控制，考察其对经济增长收敛的综合影响，那么两类驱动各自的作用如何呢？回答这一问题也有助于澄清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究竟来源于何处，进而为政府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接下来，我们仅考虑周边地区创新驱动和仅考虑本地区创新驱动，对收敛方程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分周边与本地创新驱动的条件 β 收敛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 变量 | 仅考虑周边地区创新驱动 | | | | 仅考虑本地区创新驱动 | | | |
|------------------|----------------------|---------------------|----------------------|----------------------|----------------------|---------------------|----------------------|----------------------|
| | 全国 | 东部 | 中部 | 西部 | 全国 | 东部 | 中部 | 西部 |
| α | 0.423*** (0.000) | 0.446*** (0.000) | 0.390** (0.020) | 0.345*** (0.004) | 0.410*** (0.000) | 0.446*** (0.000) | 0.477*** (0.002) | 0.297*** (0.010) |
| β | -0.109*** (0.000) | -0.055 (0.136) | -0.125*** (0.001) | -0.169*** (0.000) | -0.085*** (0.000) | 0.003 (0.918) | -0.109*** (0.008) | -0.159*** (0.000) |
| λ | 0.607*** (0.000) | 0.55*** (0.000) | 0.443*** (0.000) | 0.493*** (0.000) | 0.564*** (0.000) | 0.589*** (0.000) | 0.489*** (0.000) | 0.426*** (0.000) |
| W_{Inn} | 0.050*** (0.000) | 0.05*** (0.001) | 0.071 (0.230) | 0.052** (0.040) | / | / | / | / |
| Inn_{-1} | / | / | / | / | 0.008*** (0.001) | 0.013*** (0.000) | 0.023 (0.239) | -0.010 (0.369) |
| s | 0.014 | 0.007 | 0.017 | 0.023 | 0.011 | -0.0004 | 0.014 | 0.022 |
| τ | 48.198 | 97.235 | 41.701 | 29.897 | 62.347 | -1678.6 | 48.263 | 31.952 |
| $\overline{R^2}$ | 0.842 | 0.866 | 0.779 | 0.768 | 0.835 | 0.881 | 0.785 | 0.751 |
| $LogL$ | 673.266 | 255.881 | 184.532 | 256.51 | 670.183 | 259.615 | 184.533 | 255.025 |

注：括号内数字为显著性概率 p 值；***、**、* 分别代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此项为空；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予以略去。

由表 2 的估计结果可知，仅考虑周边地区创新驱动时，全国范围内经济增长仍然存在显著的条件 β 收敛特征。与未考虑创新驱动相比，收敛速度提高到 1.44%，半衰期缩短为 48.198 年；东部地区收敛系数估计值为负；中、西部地区仍存在俱乐部收敛，但是收敛速度和半衰期并没有显著变化。这表明周边地区的创新驱动有助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经济收敛，但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创新活动比较活跃，地区间的交流合作也较为频繁，因而创新知识溢出效果较好，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收敛。而中、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创新活动也较为闭塞，因而也使得其对地区间经济收敛的影响并不明显。

仅考虑本地区创新驱动时，全国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样存在显著的条件 β 收敛特征，但其收敛速度和半衰期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东部地区收敛系数估计值为正，不存在 β 收敛；中部地区的收敛速度减慢，半衰期延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本地区创新驱动对经济收敛的作用并不明显，而且还有可能影响其收敛进程。

创新驱动往往与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创新实力相联系，如果一个地区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创新能力较强，那么其就有可能获得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进而拉大与落后地区的差距。

从上文分析可看出，创新驱动促进经济收敛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地区间的创新合作与交流，即创新驱动对经济收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区互动的维度。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技术溢出与扩散能够缩小不同地区间创新水平的“位势差”，并最终促进经济收敛。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和资源禀赋极不平衡，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落后地区在创新基础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单靠其自主创新难以缩小差距，因此先进技术的引入有助于促进落后地区创新驱动水平的提升，并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向发达地区的追赶（杨朝峰等，2015；李文亮和许正中，2015）；其次，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行为也是导致地区间创新互动的关键因素。正如前文所言，地方政府的策略性竞争行为会导致创新活动产生“趋同效应”，即如果某省区采取政策措施推动了创新驱动战略的落实，则周边地

区也会随之跟进（韩永辉等，2015；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最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交通条件已经突破距离的约束，地区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也使得创新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更为迅速（张宏和彭国川，2007）。由此，创新驱动的空间互动作用表现为经济差距缩小的正外部效应。就各地区自身的创新活动而言，其本身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对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并不稳定，而且很有可能由于各地区创新生产基础条件的不同而致使经济发展差距趋于扩大。

（三）稳健性检验

以上研究采用的空间计量模型是基于空间相邻的 0-1 权重矩阵来构建的。这种权重矩阵假定当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相邻时，空间权重矩阵中对应的项目取 1，不相邻时就取 0，即它们之间没有联系。这与

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比如，北京与天津相邻，与上海不相邻，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北京与上海之间没有联系。为了克服这一弊端，Tiiu 和 Friso（2008）构建了空间距离权重矩阵，其假定是两个地区间距离越近，空间联系就越大，反之，空间联系越小。空间距离权重矩阵的表达形式如式（6）所示：

$$\omega_{ij} = \begin{cases} 1/d^2, & i \neq j \\ 0, & i = j \end{cases} \quad (6)$$

其中， d 为两地区地理中心位置之间的距离。

利用空间距离权重矩阵作为影响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与创新驱动空间分布的空间因子，对式（2）和（3）进行重新估计，其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基于距离权重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 变量 | 不考虑创新驱动 | | | | 考虑创新驱动 | | | |
|--------------------|----------------------|---------------------|----------------------|----------------------|----------------------|---------------------|----------------------|----------------------|
| | 全国 | 东部 | 中部 | 西部 | 全国 | 东部 | 中部 | 西部 |
| α | 0.404*** (0.000) | 0.395*** (0.000) | 0.417*** (0.009) | 0.201** (0.014) | 0.380*** (0.000) | 0.397*** (0.000) | 0.194 (0.285) | 0.191** (0.033) |
| β | -0.107*** (0.002) | 0.003 (0.942) | -0.139*** (0.001) | -0.174*** (0.000) | -0.127*** (0.000) | -0.061* (0.076) | -0.130*** (0.005) | -0.189*** (0.000) |
| ρ 或 λ | 0.676*** (0.000) | 0.542*** (0.000) | 0.434*** (0.000) | 0.879*** (0.000) | 0.734*** (0.000) | 0.769*** (0.000) | 0.427*** (0.000) | 0.798*** (0.000) |
| W_{Inn} | / | / | / | / | 0.066*** (0.002) | 0.061*** (0.006) | 0.082 (0.482) | 0.149** (0.040) |
| Inn_{-1} | / | / | / | / | 0.006** (0.038) | 0.012*** (0.000) | 0.013 (0.533) | -0.001 (0.908) |
| s | 0.016 | -0.0004 | 0.021 | 0.027 | 0.019 | 0.009 | 0.020 | 0.030 |
| τ | 42.873 | -1619.77 | 32.420 | 25.382 | 35.724 | 77.090 | 34.841 | 23.161 |
| \bar{R}^2 | 0.831 | 0.853 | 0.743 | 0.824 | 0.843 | 0.905 | 0.735 | 0.816 |
| $LogL$ | 671.702 | 253.488 | 181.114 | 260.951 | 678.524 | 265.184 | 181.771 | 264.071 |

注：括号内数字为显著性概率 p 值；***、**、* 分别代表 1%、5% 和 10% 的水平显著；“/” 表示此项为空；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予以略去。

从表 3 所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新的空间权重以后，全国及各地区的经济收敛系数创新驱动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同时，创新驱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与前文的模型估计结果也基

本一致。这也表明，虽然模型的空间权重有所改变，但并没有改变前文的基本结论。结果具有稳定性^①。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在对我国各地区创新驱动能力进行测度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考虑空间效应的收敛模型,实证考察了创新驱动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条件 β 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特征。积极探索建立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机制,搭建区域合作平台,藉此增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将有助于我国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另外,中央还可以在在国家层面统筹区域发展策略,制定相关政策,并向落后地区倾斜,促进创新要素和经济资源向落后地区流动。落后地区亦可以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积极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技术,从而实现本地经济向先进地区的追逐甚至赶超。

研究还发现,创新驱动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周边地区创新驱动的知识溢出有利于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收敛,而本地区自身的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并不稳定,甚至可能会拉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本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我们在落实创新驱动战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其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这就需要地区间破除行政及市场分割壁垒,促进研发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技术知识的交流共享,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白俊红、卞元超:《中国政府 R&D 资助空间自相关特征研究》[J],《科研管理》2016 年第 1 期。
2. 白俊红、蒋伏心:《协同创新、空间关联与区域创新绩效》[J],《经济研究》2015 年第 7 期。
3. 陈波:《论创新驱动的内涵特征与实现条件——以“中国梦”的实现为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
4. 韩永辉、黄亮雄、王贤彬:《产业结构升级改善生态文明了吗》[J],《财贸经济》2015 年第 12 期。
5. 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J],《经济学家》2013 年第 1 期。
6. 李文亮、许正中:《考虑空间效应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溢出效应研究》[J],《软科学》2015 年第 4 期。
7. 李永友、沈坤荣:《辖区间竞争、策略性财政政策与 FDI 增长绩效的区域性特征》[J],《经济研究》2008 年第 5 期。
8. 林毅夫、张鹏飞:《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技术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 年第 1 期。
9. 刘志彪:《从后发到先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理论思考》[J],《产业经济研究》2011 年第 4 期。
10. 宋马林、王舒鸿:《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3 年第 3 期。
11. 吴敬琏:《加快增长模式转型是我国走出危机的必由之路》[J],《中国流通经济》2011 年第 1 期。
12. 任玲玉、薛俊波、刘银国、王铮:《R&D 边际生产力驱动区域经济收敛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4 年第 11 期。
13. 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2004 年第 1 期。
14. 徐现祥、李郇:《中国省区经济差距的内生制度根源》[J],《经济学(季刊)》2005 年第 4 期(增刊)。
15. 杨朝峰、赵志耘、许治:《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收敛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5 年第 1 期。
16. 张来武:《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中国软科学》2011 年第 12 期。
17. 张宏、彭国川:《技术追赶与经济收敛:基于面板数据的 LSDV 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
18. 赵锦春、谢建国:《有效需求体制、功能性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基于 OECD 国家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4 年第 4 期。

中小企业股权集中度、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

李健, 杨蓓蓓 (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 潘镇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本文以中国中小企业为对象, 研究了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 并进一步讨论了产品市场竞争和产权性质的情境效应。实证结果表明: 企业股权集中程度越高, 企业创新持续投资越低; 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强; 同时与非民营企业相比, 民营企业中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负向影响更强。

关键词: 股权集中度; 产品市场竞争; 产权性质; 企业创新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目前, 国内外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研究主要从两大视角: 一是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因

素研究, 包括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两大视角[1-3]。内部条件主要包括创新意识和创新认识、创新人才保有性、研发投入、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模式等, 而体制环境、相关法律、创新的社会协作性及政府优惠政策等是主要外部因素。二是从平滑的视角研究企业创新投资波动, 主要包括企业储蓄[4]和营运资本[5]对企业创新投资波动的平滑作用在创新持续投资活动中, 企业大股东或

控股股东可能在创新投入阶段最大化其控制权私人利益[6], “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活动持续投资。并且, 企业创新活动是一个长期的多阶段的过程, 这给大股东利用控制权最大化私人利益提供了机会, 因此本文尝试从股权集中度视角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进行研究。

1 研究假设

1.1 中小企业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

中国中小企业大多数集中在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低价竞争已经无法使其获得持

续发展。研究表明, 持续创新是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以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对其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一方面, 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 难以提供合格抵押物来降低贷款风险[7], 金融机构提供有限的贷款机会; 另一方面, 外部投资者无法获得创新方面真实的信息, 难以对创新项目的优劣做出较准确的评估, 从而要求较高的风险溢价, 增加了外部融资成本[5]。因此, 中国中小企业持续创新面临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 主要依赖内部融资。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家族企业传承中的企业家社会资本差异、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研究”(713021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家社会资本、战略过程与企业绩效”(7117205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制度距离、经验学习与跨国经营绩效: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考察”(71172044), “江苏民营经济研究基地”阶段性研究成果(2106B01)。

收稿日期: 2015-08-04

作者简介: 李健(1981-), 男, 江苏盐城人,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研究方向: 社会资本与企业战略。

现代金融学认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投资者往大的私人收益[8]。相对于其他股东,少数的大股东持有较多股份额,资产流动性限制比较大[6],从而承担企业创新带来的大部分风险。此外,中小企业技术落后、人才等关键资源匮乏[9]以及技术创新风险

规避机制不健全[10]导致持续创新往往面临更多的风险。因此,本文认为随着中小企业股权的集中,为了降低创新持续活动的风险,大股东越有可能通过以下措施减弱创新持续性活动(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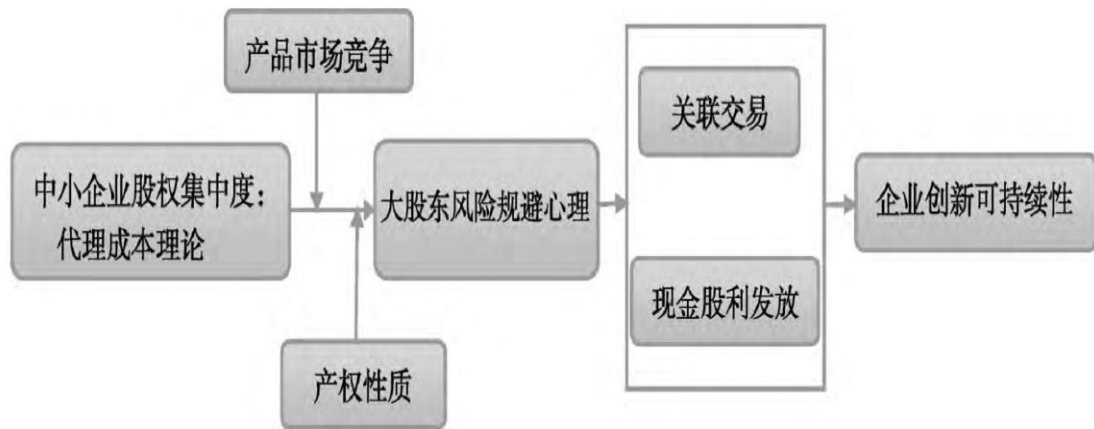


图1 本文理论逻辑框架

(1) 关联交易行为对创新持续性的削弱。目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市场监管机制还不完善,法律法规对中小投资者保护还存在不足,这给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提供了环境条件。此外,创新活动是多阶段、复杂的过程,需要企业内部各部门以及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和配合,必然会将资源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分配,进行资源的输入和输出,存在利益寻租空间。并且,创新过程的信息不对称性[5]使大股东的关联交易行为不易被察觉。因此,大股东有可能为了降低创新投资风险,采取资金占用等关联交易方式来获得控制权私人利益,从而阻碍企业创新持续推进。

(2) 现金股利发放对创新持续性的削弱。企业创新可持续性要求企业不断对创新活动投入资

金。然而,现金股利的发放使企业内部留存现金减少[11],将直接影响公司的后续投资能力和应对资金短缺的能力[12]。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由于风险规避心理,越有可能采用隐蔽性比较好的现金股利分派转移公司利益,导致企业创新过程对资金需求无法满足,进而无力进行连续系统的创新投资。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中小

企业股权集中度越强,企业的创新可持续性越弱。

1.2 产品市场竞争的情境效应

产品市场竞争增强了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风险,大股东产生更强的风险规避心理,从而阻碍企业创新可持续性。首先,中小企业积累的经济实力有限,且产品市场竞争使利润降低,因此,企业面临着创新再投资与保持生存的选择。此时,大股东的风险规避心理发挥主导作用,可能为了保证企业的生存,减少或中断企业内部融资对创新的再投入。其次,中小企业缺乏制度化的组织惯例与获取企业内外部知识的机制[13],无法及时获得消费者变化的需求,以及根据竞争对手的行动对创新进行及时调整;并且,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的风险规避机制不健全[2],面临竞争对手的攻击时,企业创新容易陷入困境;因此,产品市场竞争加剧了持续创新过程的风险,阻碍创新持续进行。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产品市场竞争强化了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负向影响。

1.3 产权性质的情境效应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产权制度安排还不完善,产权结构不仅影响企业创新资

源的分配机制,而且对企业的大股东有不同的约束机制。

(1)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外部资源获取方面存在差异。总体来看,民营企业仍然在许多方面面临着严重的所有制歧视。一方面,民营企业的贷款风险较高,银行更愿意为非民营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提供贷款[14];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天然的联系使得政府同国有企业建立同盟关系,要求国有企业承担部分政策性负担,作为回报,国有企业可以获得税收减免以及贷款优惠等[15]。因此,相对于国有企业,在企业创新活动中,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政府的补助或信贷优势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大股东的风险规避心理,进而有可能持续推进企业创新活动。

(2)不同产权性质中大股东面临的约束机制不同。非民营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大股东或控股

股东利用关联交易、资金占用等手段来“侵害”企业的行为不仅要承担的政治成本和声誉风险,而且获得的私人收益有限[16]。然而,由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高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控股股东有更强烈的动机侵占企业资金[17]。因此,相对于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大股东产生“侵害效应”的可能性与程度更大,进而导致创新持续投资不足或中断。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相对于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股权集中度对创新可持续性的负向影响更强。

2 回归模型与变量说明

本文设定了回归方程(1)来研究假设1,即中小企业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之间的直线关系。

$$Innov_{i,t} = \alpha + \beta_1 \times Vrd + \gamma \times Control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时间, μ_i 表示个体特质效应, η_t 表示时间效应, $\varepsilon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Innov*代表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本文借鉴鞠晓生等[5]的做法,采用无形资产增量来反映企业创新可持续性。*Vrd*代表股权集中度,本文参照李婧和

贺小刚[18]的计算方法,即 $Vrd = \sum (vri/T_vr)^2$,其中*vri*为前十大股东每人所持有的股份,*T_vr*为前十大股东所持股份总和。该指标越大,股权集中度越高。根据理论假设1,本文预期 β_1 的系数显著为负。*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集合,参照鞠晓生等的研究,本文主要纳入以下控制变量:①企业现金流(CF),以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作为其代理变量。②企业负债(Debt),以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对其赋值。③企业规模(Size),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进行测量。

为检验假设2,本文设置了回归方程(2)进行检验。

$$Innov_{i,t} = \alpha + \beta_1 \times Vrd_{i,t} + \beta_2 \times PC_{i,t} + \beta_3 \times Vrd_{i,t} \times PC_{i,t} + \gamma \times Control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中,PC代表产品市场竞争。姜付秀等[19]认为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的存货周转速度将越低,因此,本文用存货周转率的倒数来解释产品市场竞争,该指标越大,表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使用标准化后的*Vrd*与PC的乘积项(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用标准化处理后的变量相乘获得乘积项),代表产品市场竞争对股权集中度与创新可持续性之间关系的情境效应。根据假设2,本文预期 β_3 的系数显著为负。

为检验假设3,本文参照李健和陈传明[20],根据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划分企业的产权性质。将实际控制人为国家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集团企业的企业划为非民营企业,赋值为0;把实际控制人为个人、家族或外资公司等统一作为民营企业,赋值为1。本文预期以该指标做分组回归后,中小企业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关系在分组回归中应当出现差异。

3 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

3.1 研究样本与描述统计

本文以2007—2014年中小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按照以下标准对原始样本进行筛选:①剔除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②剔除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样本;③在1%的水平

下对公司层面的连续变量缩尾处理。最终，样本为 682 家截面企业构成的、观测值为 3406 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数据全部来自 CSMAR 数据库，统计软件为 STATA12.0。表 1 报告了回归方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其中，股权集中度 (Vrd) 的最小值为 -2.011，最大值为 -0.131，均值为 -0.983，标准差为 0.432，这表明股权集中度在样本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

表 1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 变量名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Innov | 16.322 | 1.785 | 11.082 | 19.722 |
| Vrd | -0.983 | 0.432 | -2.011 | -0.131 |
| PC | -1.299 | 1.046 | -12.204 | 2.859 |
| CF | 18.254 | 1.251 | 14.617 | 21.156 |
| Debt | 19.027 | 1.573 | 14.494 | 22.359 |
| Size | 21.227 | 0.803 | 19.567 | 23.566 |
| Ownship | 0.790 | 0.407 | 0 | 1 |

表 2 报告了回归方程中主要变量之间 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全部低于 0.6，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但是，Pearson 相关系数所反映的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往

往混合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因此，需要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中小企业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以获得它们之间准确的关系方向、影响水平和显著性程度。

表2 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 变量名 | Innov | Vrd | PC | CF | Debt | Size | Ownship |
|---------|----------------------|-----------------------|-----------------------|-----------------------|-----------------------|-----------------------|---------|
| Innov | 1 | | | | | | |
| Vrd | 0.025 | 1 | | | | | |
| PC | 0.017 | 0.006 | 1 | | | | |
| CF | 0.186 ^{***} | 0.083 ^{***} | -0.174 ^{***} | 1 | | | |
| Debt | 0.164 ^{***} | 0.137 ^{***} | 0.021 | 0.267 ^{***} | 1 | | |
| Size | 0.320 ^{***} | 0.101 ^{***} | -0.007 | 0.630 ^{***} | 0.567 ^{***} | 1 | |
| Ownship | 0.017 | -0.195 ^{***} | 0.100 ^{***} | -0.106 ^{***} | -0.029 ^{***} | -0.097 ^{***} | 1 |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结果保留三位小数。

3.2 回归检验与实证方法

(1)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本文选用FishADF检验和Fish-PP检验对文中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这两个检验的原假设都是

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相关变量数据存在平稳性，可以进行回归实证。

表3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 变量名 | Innov | Vrd | PC | CF | Debt | Size |
|-------------|------------------------|------------------------|------------------------|------------------------|------------------------|------------------------|
| Fish-ADF 检验 | -7.369 ^{***} | -11.745 ^{***} | -13.127 ^{***} | -5.529 ^{***} | -6.022 ^{***} | -3.208 ^{***} |
| Fish-PP 检验 | -14.443 ^{***} | -8.192 ^{***} | -21.348 ^{***} | -19.365 ^{***} | -18.876 ^{***} | -11.541 ^{***} |

注：以上报告了Fish-ADF检验和Fish-PP检验Z统计量结果，显示四舍五入后保留三小数点的结果；*、**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2) 回归检验与实证方法。在对回归方程进行回归之前，本文对各回归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序列相关检验，分别报告了各回归方程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的VIF值、异方差检验的chi2值、序列相关检验的F值，具体结果如表4。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回归方程存在异方差问题，但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问题和序列相关问题，对于企业个体效应 μ_i ，本文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对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判断选择；其次，为保证个体效应 μ_i 存在，对筛选出来的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型与混合回归模型进行选择检验。通过报告各回归模型的混合回归检验F值和P值概率进行判

断。最后,对各回归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时,发现随机效应模型的基本假设均得不到满足(尽管 Hausman 检验 χ^2 值都不显著,应该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但由于“ $V_b - V_B$ is not positive definite”,这表明随机效应的前提假设— $\text{Corr}(x_{it}, u_i)=0$ 无法得到满足,因此此时仍然应该选

择固定效应模型(Schreiber, 2008)),所以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3.3 实证结果

实证结果分为三部分,一是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影响的分析;二是产品市场竞争情境效应分析;三是产权性质情境效应分析,如表 4 所示。

表 4 实证结果

| 解释变量 | 模型 (1) | 模型 (2) | 模型 (3) | 模型 (4) | 模型 (5) |
|---------------------------------------|---------------------|---------------------|---------------------|---------------------|-------------------|
| CF | -0.105 (0.083) | -0.081 (0.083) | -0.076 (0.083) | -0.115 (0.097) | -0.007 (0.167) |
| Debt | 0.013 (0.089) | 0.022 (0.089) | 0.029 (0.090) | -0.006 (0.100) | 0.156 (0.196) |
| Size | 0.629*** (0.183) | 0.628*** (0.183) | 0.639*** (0.184) | 0.772*** (0.213) | 0.229 (0.386) |
| Vrd | | -0.900** (0.398) | -0.971** (0.401) | -1.152** (0.468) | -0.606 (0.798) |
| PC | | | 0.091 (0.224) | | |
| $\overline{Vrd} \times \overline{PC}$ | | | -0.307** (0.154) | | |
| 共线性检验 | 1.10 - 2.42 | 1.02 - 2.42 | 1.02 - 2.44 | 1.03 - 2.40 | 1.03 - 2.50 |
| 异方差检验 | 2.4e + 35*** | 3.4e + 33*** | 3.1e + 32*** | 7.0e + 32*** | 4.8e + 31*** |
| 序列相关检验 | 0.004 | 0.000 | 0.000 | 0.215 | 0.620 |
| Hausman 检验 | 1.06 | 5.14 | 7.40 | 7.10 | 2.01 |
| 混合回归检验 | 1.54*** | 1.56*** | 1.54*** | 1.53*** | 1.67*** |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多重共线性检验报告了每个回归方程中变量的VIF取值范围;异方差检验报告了异方差检验的 χ^2 值及显著性结果;序列相关检验报告了一阶序列相关检验的F值及显著性结果;Hausman检验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选择检验的 χ^2 值及显著性结果;混合回归检验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选择检验的F值及显著性结果;括号内为标准误。

模型(1)报告了仅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报告了回归方程(1)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Vrd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中小企业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有阻碍作用,本文假设1得到验证。

模型(3)检验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与产品市场竞争交叉乘积项 $Vrd \times PC$ 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产品市场竞争增强了中小企业股权集中

度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负向影响。本文假设2得到验证。

模型(4)~(5)反映了中小民营企业样本组与中小非民营企业样本组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关系的回归结果。在模型(4)结果中可以看出,在中小民营企业中,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负向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而在中小非民营中,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尽管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企业的产权性质

的确会影响中小企业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假设3得到证实。

4 分析与讨论

本文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产品市场竞争增强了中小企业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负向影响;并且,相对于中小民营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中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微观企业管理和宏观政策制定两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①中小企业应适当降低股权集中度,减弱企业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对企业的“掏空”行为,促进创新的持续进行,增强中小企业竞争力;②尽管国家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集中度有所降低,但中小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度还比较高。在此情况下,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大股东形成制度约束和监督,同时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③由于缺乏创新的持续资金投入,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应适当地向中小企业倾斜,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

参考文献:

- [1] 刘建新, 刘建敏, 阿梅, 刘北辰.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6(1):60-61.
- [2] 程国平, 戴松高, 宁磊. 企业自主创新的可持续性瓶颈及对策研究 [J]. 当代经理人, 2006(21):740-741.
- [3] 程国平, 宁磊. 企业自主创新的可持续性研究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7(10):86-88.
- [4] BROWN J, PETERSEN B. “Cash holdings and R&D smoothing”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 17(3):694-709.
- [5] 鞠晓生, 卢荻, 虞义华. 融资约束、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 [J]. 经济研究, 2013(1):4-16.
- [6] 杨建君, 盛锁. 股权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J]. 科学学研究, 2007(4):787-792.
- [7] 梁冰.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及融资状况调查报告 [J]. 金融研究, 2005(5):120-138.
- [8] 郑梅莲, 何晓婷. 股权集中度、企业规模、产权性质与企业市场价值的实证研究——基于投资者视角 [J]. 经营与管理, 2014(11):102-106.
- [9] 汤临佳, 池仁勇, 骆秀娟. 中小企业创新政策前沿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8):138-147.
- [10] 宋成伟. 我国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思考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8(2):27-29.
- [11] EASTERBROOK F H. Two agency-cost explanations of dividend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 74(4):650-659.
- [12] 王磊, 袁进明, 王国磊. 产品市场竞争、股权集中与现金股利政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J]. 金融市场, 2013(5):64-70.
- [13] JONES O, MACPHERSON A.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strategic in SMEs: extending the 4I framework [J]. Long range planning, 2006, 39(2):155-175.
- [14] 张敏, 张胜, 申慧慧, 王成方. 政治关联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管理世界, 2010(11):143-153.
- [15] 廖冠民, 沈红波. 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动因、后果及治理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6):96-108.
- [16] 万丛颖, 张楠楠. 大股东的治理与掏空——基于股权结构调节效应的分析 [J]. 财经问题研究, 2013(7):42-49.
- [17] 刘运国, 吴小云. 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 [J]. 管理学报, 2009(12):1661-1669.
- [18] 李靖, 贺小刚. 股权集中度与创新绩效:国有企业与家族企业的比较研究 [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2(10):40-51.
- [19] 姜付秀, 屈耀辉, 陆正飞和李焰. 产品

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J]. 经济研究, 2008(4):99—110.

[20] 李健, 陈传明. 企业家政治关联、所有

制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基于转型经济制度背景的实证研究 [J]. 金融研究,

2013(3):157—169.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记商学院 13 级大创结项答辩的成功举办

为了完成商学院 13 级大创的完美收官，充分展现商学院大三学子紧跟时代潮流，敢于创新创业的风采，同时为即将参与大创的同学提供参考和学习，商学院参赛选手们在学海楼 219 举办 13 级大创结项答辩。



开场前，即将上场的选手们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其他参与观看的同学也陆续到场。下午，商学院 13 级大创结项答辩正式开始。本次结项答辩的评委老师分别是来自商学院的成春林老师以及李晋老师，参加结项的共有 5 支队伍，其队长分别是来自商学院 13 级的王伟、朱洁、高雅、徐升以及刘燕同学。第一个上场的是王伟同学带领的队伍，他们的项目名称是关于绿色金融如何让城镇化“焕发新颜”。虽说是第一个上场，王伟同学并没有怯场。他首先从项目研究背景——新型城镇化谈起，接着他阐述了这个项目的基本内容，即将绿色金融和新型城镇化对接。为此，他们对江苏泰州及类似地区政府、银行、企业进行走访调研，并结合实际，归纳出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出现的问题。最终他们得出了项目研究成果，也就是得到了绿色金融的环境效应。在做完对自己项目的阐述之后，王伟同学也认真清晰的回答了评委老师的问题，其他同学也做了相应补充。

接着上场的是由朱洁同学带领的队伍，他们主要针对的是当代大学生创业路径以

及经营模式的问题。首先，朱洁同学从创业现状、创业认知度以及创业方式三个方面对大学生创业进行了分析。接着他们以大学生 app 创业为例，对互联网创业模式进行系统分析。朱洁同学对于 app 创业的分析富有条理，让现场的评委老师频频点头。下一位进行答辩的是由高雅同学带领的队伍，他们的研究项目十分具有现实性，是关于江苏省农村商业银行的“商业性”与“支农性”冲突的问题。为了获取最真实的资料，他们前往泗洪、新沂等多地进行考察和走访，从而得出“商业性”和“支农性”矛盾的原因，包括风险意识淡薄，行政干预过度等。同时，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比如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体系等。答辩结束后，评委老师也就其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提问，也给出了一些有效的建议。



虽然大创结项答辩以进行过半，同学们仍然富有热情。下一组是由徐升同学带领的队伍，他们的项目与民生紧密相关，他们调研的对象是银行老年金融服务。这支队伍从项目概述、项目成果、结论建议以及经费使用四个方面对这个项目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由于项目内容十分贴近实际，评委老师对这个项目表示了认同，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和值得改进之处。最后进行答辩的是由刘燕同学带领的队伍，他们研究主

题是对于生态旅游 app 发展前景分析与规划。“生态旅游”这个词最近才兴起，可见这支队伍的研究十分具有独创性。他们从项目思路、服务特色以及研究成果几个方面对这个项目进行了系统总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项目本身已获创青春互联网+大赛等诸多奖项，可见其实力之强。



在最后一队进行完答辩后，本次商学院 13 级大创结项答辩圆满结束。所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虽然大创已经结项，但同学们的创业热情不会就此结束，本次的结项答辩也像一个新的开始，不断激励着同学们在创业路上越走越远，同时它还激励着更多有志于参加大创的同学积极为参加大创准备，充分体现商学院创新进取的精神，希望更多人能从中受益。



招新宣讲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soft-focus photograph of several pink roses. The roses are in various stages of bloom, with some showing deep pink centers and lighter pink outer petals. The green leaves of the roses are visible, adding a natural and vibrant feel to the design.

博学经世 厚德弘商

主办方：大学生科学与技术协会

网站：<http://sxy.njnu.edu.cn/boshi/>

邮箱：sxyyanshang@126.com